

東漢中後期直諫之風的興起： 兼論永建時期 (126-131) 皇帝與儒家官僚的共治*

許偉恒**

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

摘 要

本文嘗試論證東漢直諫之風的興起，最早可追溯至安帝 (r. 106-125) 親政後所引發的抗議運動。入至永建時期 (126-131)，太后臨朝之局未出現，加上戚宦勢力急遽衰退，儒家官僚遂乘朝廷出現短暫權力真空之機，開創與順帝 (r. 125-144) 共治之政治格局，並在朝廷積極推動直諫之風。入至陽嘉時期 (132-135)，順帝開始重用戚宦輔政，君臣共治之局逐漸消失，儒家官僚的直諫亦改為針對順帝用佞而發，諫言內容開始帶有明顯的貶天子意識，這不單導致君臣關係漸趨緊張，更埋下桓帝 (r. 146-168) 時期儒家官僚集體「汙穢朝廷」的種子。另一方面，儒家官僚秉持以直諫為忠貞的信念，並以此作為區分官員清濁的界線，這表示士人的群體自覺早於永建時期已開始萌芽。因此，順帝永建、陽嘉時期實為東漢政治文化發生巨變的重要時期。

關鍵詞：漢順帝，永建，直諫，君臣關係，儒家官僚

* 本文曾於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主辦之「清華·政治歷史學研究生論文發表會」(新竹：2022 年 5 月 13-14 日) 宣讀，會中承蒙評論人白品鍵教授指正，令筆者獲益良多。於修訂過程中，復蒙本刊諸位匿名審查委員惠賜寶貴意見，謹此一併致謝。本文曾獲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設立的蕭啟慶院士獎學金資助。

** 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候選人，電子郵件信箱：waihang29@gmail.com

一、引言

顧炎武 (1613-1682)《日知錄》「兩漢風俗」條云：

漢自孝武表章《六經》之後，師儒雖盛，而大義未明，故新莽居攝，頌德獻符者，徧於天下。光武有鑑於此，故尊崇節義，敦厲名實，所舉用者，莫非經明行脩之人，而風俗爲之一變。至其末造，朝政昏濁，國事日非，而黨錮之流，獨行之輩，依仁蹈義，舍命不渝，風雨如晦，雞鳴不已。三代以下，風俗之美，無尚於東京者。¹

顧氏「依仁蹈義，舍命不渝」之語可謂準確把握漢末的士風特徵。桓帝 (r. 146-168) 及靈帝 (r. 168-189) 時期儒家官僚「依仁蹈義，舍命不渝」的其中一種突出表現，為透過激切的直諫向天子及宦官作出嚴厲批評。桓帝時白馬令李雲 (?-160) 因露布諫帝而獲罪，² 與靈帝時前司徒陳耽 (?-185)、諫議大夫劉陶 (?-185) 坐直言下獄死，³ 均為漢末儒家官僚不惜捨命以死諫天子的赴義之舉。漢末儒家官僚敢於以所持之「道」與皇權抗衡，背後實隱含高度的貶天子意識。⁴

在此宜進一步追問：漢末直諫之風於何時開始出現？顧炎武將漢末「依仁蹈義，舍命不渝」此一精神的源頭上溯至光武帝 (r. 25-57) 尊崇節義之舉，然其觀點卻值得商榷。閻步克認為，光武帝為避免西漢末年「奉天法古」思潮重現，致力「進文吏」及「以吏事責三公」，擢用大批以苛刻為能的文法吏；⁵ 以上史實至少已表明光武帝「所舉用者，莫非經明行脩之人」的描述並不準確。閻步克進一步指出，光武帝的吏化方針為明帝 (r. 57-75) 所繼承，結果導致和帝 (r. 88-106)、安帝

¹ 顧炎武著，陳垣校注，《日知錄校注》（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7），卷 17，頁 718。

² 孫家洲對李雲「露布諫帝」獲罪一事有深入分析。孫家洲，〈漢代諫議制度的文化解讀：從李雲「露布諫帝」獲罪談起〉，收入黎明釗編，《漢帝國的制度與社會秩序》（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2），頁 167-183。

³ 范曄撰，李賢等注，《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5），卷 57，〈劉陶列傳〉，頁 1849-1850。

⁴ 余英時對古代中國知識人如何代表「道」與政統抗衡有精闢分析。余英時，《史學與傳統》（臺北：時報文化出版，1982），〈道統與政統之間：中國知識分子的原始型態〉，頁 30-70。

⁵ 閻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頁 412-415。

(r. 106-125) 之際出現「儒學陵替」的局面。⁶ 先不論閻氏關於和、安之際儒學衰微成因的分析是否合理，單憑儒學於東漢中前期一度「陵替」的事實，已足以表明顧炎武將漢末黨錮之士的精神源頭，追溯至百多年前光武帝尊崇節義之舉，是過於簡化的歷史判斷。⁷

那麼，東漢歷史中究竟出現了哪些重要轉折，使桓、靈時期「依仁蹈義，舍命不渝」的激昂士風逐漸形成？歷代史家探討漢末政治文化的巨變，多由梁冀 (?-159) 專權及桓帝用宦展開敘述。范曄 (398-445) 於《後漢書·黨錮列傳》敘文認為，漢末婞直之風的形成源於桓、靈之間「國命委於閹寺」；⁸ 余英時則視桓帝誅殺梁冀為東漢政治文化演變的重要分水嶺，並認為士大夫發展出群體自覺及形成清流集團均肇端於此際。⁹ 張蓓蓓論東漢士風轉變，同樣將成因歸於戚宦專政的影響。¹⁰ 然而，漢末政治文化的突變是否確然始自桓帝時期？漢末婞直之風的形成是否仍有再往上溯的可能？東漢士風或政治文化的轉變，又是否全然由戚宦專政此單一因素所刺激及左右？

正如上文所言，具有高度貶天子意識的激切直諫，為漢末黨錮之士「依仁蹈義，舍命不渝」精神的其中一種重要表現；這表示考察東漢諫風的轉變歷程，將有助於理解東漢政治文化的轉變軌跡。本文將分析東漢諫風於不同時期的變化，並嘗試論證順帝 (r. 125-144) 永建時期 (126-131) 為東漢諫風出現突變的轉捩點；而直諫風氣之所以逐漸盛行，則與儒家官僚於其時獲得與皇帝短暫共治的機會有關。本文亦會提出以下新觀點：順帝時期儒家官僚普遍持有以直諫為忠貞的信念，並以此作為區分官員清濁的界線，這表示士人的群體自覺至遲於永建時期已開始萌芽。入至陽嘉時期 (132-135)，順帝重新擢用外戚及宦官，誘發儒家官僚以帶有貶天子意識的直言進行諫諍，導致東漢君臣關係漸趨緊張。換言之，桓、靈時期儒家官僚集

⁶ 同前引，頁 419-420。「儒學陵替」一語出自范曄，《後漢書》，卷 32，〈樊準列傳〉，頁 1125。

⁷ 余英時曾指出顧炎武於《日知錄》「兩漢風俗」條「對漢代儒教興起的解釋未必恰當，且其言復別有所感。」事實上，顧氏在此或欲藉回顧東漢風俗以抒發其對晚明政局的感慨；其將漢末黨錮之士的精神源頭追溯至光武帝尊崇節義之舉，背後應有弦外之音，然此點與本文題旨關涉不大，故暫不作深究。余英時，《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臺北：聯經出版，1987），〈漢代循吏與文化傳播〉，頁 258。

⁸ 范曄，《後漢書》，卷 67，頁 2185。

⁹ 余英時，《中國知識階層史論：古代篇》（臺北：聯經出版，1980），〈漢晉之際士之新自覺與新思潮〉，頁 205-327。

¹⁰ 張蓓蓓，《東漢士風及其轉變》（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1985），頁 64-81。

體「汙穢朝廷」的種子早於順帝前期已告萌芽。¹¹ 以上發現將有助學界重新理解漢末黨錮之禍出現的背景與成因。

二、東漢中前期諫風的基本考察

關於東漢直諫風氣的形成，袁宏（328-376）及范曄兩名史家均曾作出論述。袁宏於《後漢紀》卷 22 的史論提出，兩漢曾出現遊說、任俠、守文、肆直四種政風，當中守文與肆直之風的興盛，與東漢政治文化的變遷有密切關係，茲引述如下：

逮乎元、成、明、章之間，尊師稽古，賓禮儒術，故人重其學，各見是其業，徒守一家之說，以爭異同之辨，而守文之風盛矣。自茲以降，主失其權，閹豎當朝，佞邪在位，忠義之士發憤忘難，以明邪正之道，而肆直之風盛矣。¹²

范曄於《後漢書·黨錮列傳》敘文同樣論及兩漢守文與肆直之風，史家普遍認為其說以袁宏之史論為本。¹³ 范曄如此描述漢末肆直之風：「逮桓靈之間，主荒政繆，國命委於閹寺，士子羞與為伍，故匹夫抗憤，處士橫議，遂乃激揚名聲，互相題拂，品覈公卿，裁量執政，肆直之風，於斯行矣。」¹⁴ 肆直與肆直名雖異而意相近，均指剛直之諫，亦即類近於傳統儒家五諫說中的指諫及陷諫。

傳統儒家一向有五諫之說，《白虎通·諫諍》曾對五諫作出詳盡解說：

¹¹ 「汙穢朝廷」一語出自范曄，《後漢書》，卷 67，〈黨錮列傳〉，頁 2195。

¹² 袁宏撰，周天游校注，《後漢紀校注》（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卷 22，〈孝桓皇帝紀下〉，頁 626。

¹³ 陳寅恪、王鳴盛及劉咸忻均認為袁宏《後漢紀》卷 22 的史論為范曄《後漢書·黨錮列傳》敘文之所本。陳寅恪認為二文「不獨意旨全同，且多用『矣』字，決無此偶合之事」，判定二文有承傳關係；王鳴盛認為范曄稍取袁宏之論，然袁宏「深斥黨人之非，用意與蔚宗不同」；劉咸忻則謂「王鳴盛謂稍取之，用意不同，非也。」事實上，袁、范二論同中有異，下文將作深入分析。陳寅恪，《陳寅恪集：讀書札記二集》（北京：三聯書店，2001），頁 87-88；王鳴盛著，黃曙輝點校，《十七史商榷》（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5），卷 38，〈後漢書十〉，頁 266；劉咸忻著，黃曙輝編校，《劉咸忻學術論集：史學編》上冊（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後漢書知意〉，頁 285。

¹⁴ 范曄，《後漢書》，卷 67，〈黨錮列傳〉，頁 2185。

人懷五常，故知諫有五。其一曰諷諫，二曰順諫，三曰闕諫，四曰指諫，五曰陷諫。諷諫者，智也。知禍患之萌，深睹其事，未彰而諷告焉。此智之性也。順諫者，仁也。出詞遜順，不逆君心。此仁之性也。闕諫者，禮也。視君顏色不悅，且卻，悅則復前，以禮進退。此禮之性也。指諫者，信也。指者，質也。質相其事而諫。此信之性也。陷諫者，義也。惻隱發於中，直言國之害，勵志忘生，為君不避喪身。此義之性也。孔子曰：「諫有五，吾從諷之諫」。事君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去而不訕，諫而不露。故〈曲禮〉曰：「為人臣，不顯諫。」¹⁵

《白虎通》五諫中的諷諫、順諫及闕諫，明顯不屬袁、范二氏所謂的倬直或肆直之諫，茲不詳論。指諫即「質相其事而諫」，陳立 (1809-1869) 釋之為「無所私隱，直指其事」，¹⁶ 可知指諫近於倬直與肆直之諫。至於「惻隱發於中，直言國之害，勵志忘生，為君不避喪身」的陷諫，則與桓、靈時期李雲、劉陶為直言不惜獲罪的諫行相近；「勵志忘生」之語更與黨錮之士「依仁蹈義，舍命不渝」的精神相通。然而，傳統儒家一向以諷諫為上，並不完全認可肆意揭露人主之非的直諫，這從《白虎通》文末引錄孔子及〈曲禮〉的文字可以得見。傳統儒家既主張「諫而不露」，漢末黨錮之士卻為何普遍認同並實踐直諫？這種直諫風氣是如何及於何時逐漸形成？

細究袁、范二氏關於東漢直諫之風的論述，可發現兩種觀點同中有異。首先，袁、范二氏均認同肆直或倬直之風主要由宦官干政所引發，袁氏「主失其權，闕豎當朝，佞邪在位，忠義之士發憤忘難」及范氏「主荒政繆，國命委於闕寺，士子羞與為伍，故匹夫抗憤，處士橫議」之語均反映此點。然而，二人對直諫之風形成的時間則有著不同理解。袁宏認為兩漢守文之風於明、章時期 (57-88) 大盛，然「自茲以降，主失其權，闕豎當朝，佞邪在位」，可見袁宏認為東漢直諫之風於和帝時期開始盛行。范曄則明言倬直之風遲至桓、靈之間始告出現。

袁、范二氏對東漢直諫風氣形成的時間有著不同理解，二說究竟孰是孰非？這必須深入考察東漢各時期的諫議情況，始能獲得較確切的答案。《冊府元龜·諫諍部》卷 523 至卷 548 將歷代重要諫言分部列述，當中共收錄 79 則東漢時期的諫

¹⁵ 陳立撰，吳則虞點校，《白虎通疏證》（北京：中華書局，1994），卷 5，頁 235-236。

¹⁶ 同前引，頁 236。

言，¹⁷ 統計這批諫言的時間分布，將有助於獲得對東漢諫風演變的初步認識。〈諫諍部〉所列五種諫諍方式分別為諷諫、規諫、直諫、彊諫、遺諫，其中遺諫取代了《白虎通》的順諫，彊諫則近於《白虎通》的陷諫。該 79 則諫言可按年代及諫諍方式整理如表一：

表一：《冊府元龜·諫諍部》所載東漢歷朝諫言統計表¹⁸

	光武帝 32 年	明帝 18 年	章帝 13 年	和帝 18 年	鄧后臨朝 15 年	安帝親政 4 年	順帝 19 年	質、桓 23 年	靈帝 21 年
諷諫	1	2	1	1	1	1	0	0	1
規諫	5	1	2	2	2	1	2	2	4
直諫	6	0	2	4	0	3	8	11	9
彊諫	2	0	0	0	0	0	0	0	0
遺諫	1	2	0	0	0	0	0	1	1
總數	15	5	5	7	3	5	10	14	15

現先考察東漢不同時期的諫言總數。據表一可知〈諫諍部〉共收錄 15 則光武帝時期的諫言，入至明、章時期諫言數量明顯減少。〈諫諍部〉所收錄和帝時期的諫言數量雖一度增加，然至鄧太后 (81-121) 臨朝時期跌至新低，15 年間只得 3 則諫言。順帝朝為諫言數量急升的重要時期，19 年間共有 10 則諫言被收錄，至桓、靈時期諫言數量更達至高峰。若集中考察不同時期直諫和彊諫的數量，可發現東漢直諫之風的興起亦始自順帝時期，該 19 年間的直諫數量（8 次）幾乎等同明帝至安帝五朝 68 年的總和（9 次）。

統計《冊府元龜·諫諍部》所載諫言數量，可得出東漢直諫風氣於順帝時期興起的初步結論，這與袁、范二氏的論述並不相同。然而，《冊府元龜·諫諍部》未說明對歷朝諫言的收錄準則，該書亦未全面收錄東漢的重要諫言，如《後漢書》所載安帝時期名臣楊震 (54-124) 的諸篇諫言，便未見於〈諫諍部〉。為求更準確了解東漢諫風的演變軌跡，下文將就東漢各朝直諫之臣的數量作出全面統計。

本文判斷直諫之臣的準則主要有二：一、該人物以直諫顯名，如史書曾載該人物有質直、抗直或好直言的特質；二、史書記載該人物曾有至少兩次直諫之行或認

¹⁷ 王欽若等編纂，周勛初等校訂，《冊府元龜（校訂本）》第 6 冊（南京：鳳凰出版社，2006），卷 523-548，頁 5936-6275。

¹⁸ 計算各統治者的統治年期時，不足半年者將不納入計算，超過半年者則增加一年。

同直諫的表現。鑑於史籍記載曾經進諫的東漢人物甚多，如視一切曾進諫者均為直諫之臣，竇憲 (?-92) 亦會因上諫章帝不宜與白衣會而被計算在內。¹⁹ 為求嚴謹，本文只將曾兩次進行或認同直諫的人物納入計算之中。²⁰ 此外，由於本文專門考察直諫之風的形成，故只統計人物的直諫及彊諫之行，至於諷諫、遺諫等則不作計算。必須指出，本文特別著重分析東漢時期的君臣關係，故主要計算臣下針對君主之直諫。然而，鑑於東漢中葉起頻繁出現太后臨朝及外戚專權之局，因此針對當權貴戚的直諫行為亦被計算在內；至於地方掾屬對太守的直諫則不納入統計。關於人物的年代劃分，本文主要以該人物正式任職中央的時間為計算之始，如該人物於地方任職時已有針對君主的直諫則不在此限。最後，桓、靈二朝肆直、倖直風氣盛行已為學界的普遍共識，故本文並不計算二朝的諫臣數量，以省篇幅。

根據以上諸原則，本文製作「東漢中前期直諫之臣表」（附表）。根據此表，光武帝時期共出現 19 名直諫之臣，至明、章時期則下跌至各 14 人。直諫之臣的數量於和帝時期一度上升至 17 人，然至鄧太后臨朝時期下跌至 12 人。安帝親政時期直諫之臣人數再度上升至 19 人，至順帝時期更攀升至 26 人，為東漢中前期的高峰。以上考察恰與《冊府元龜·諫諍部》所反映的諫風變化趨勢接近，均將直諫風氣盛行的起始點指向順帝時期。當然，單憑諫言及直諫之臣的數量變化並不足以坐實以上論斷，往後仍需深入分析東漢中前期各時期的諫風特徵，始能更準確把握東漢諫風的轉變歷程。下文嘗試以附表的統計為基礎，進一步考察東漢諫風的變化軌跡。

現先探討直諫之風於東漢前期一度沉寂之況。附表顯示光武帝時期共出現 19 名直諫之臣，然光武帝統治長達 32 年，較明、章二帝的總在位時期更久，可知光武帝時期直諫之風並非特別盛行。事實上，光武帝於建武十二年 (36) 統一天下後致力強化君權，其「以吏事責三公」的施政方針使大臣動輒得咎。建武十三年至二十年間，大司徒韓歆 (?-39)、歐陽歙 (?-39)、戴涉 (?-44) 相繼坐事下獄死，當中韓歆便因「好直言，無隱諱」及「證歲將飢凶，指天畫地，言甚剛切」而被罷免，後更因光武帝「復遣使宣詔責之」而與子自殺。²¹ 此外，鮑永 (?-42) 因韓歆事固請而忤帝意，出為東海相；申屠剛（生卒年不詳）亦因「以數切諫失旨」而外遷。²²

¹⁹ 范曄，《後漢書》，卷 52，〈崔駰列傳〉，頁 1719。

²⁰ 《後漢書》載魯恭 (32-112) 曾有兩次直諫之行，然范曄明言其「不以剛直為稱」，故本文不視其為直諫之臣。同前引，卷 25，〈魯恭列傳〉，頁 875-882。

²¹ 同前引，卷 26，〈侯霸列傳〉，頁 902。

²² 同前引，卷 29，〈鮑永列傳〉，頁 1020；〈申屠剛列傳〉，頁 1017。

光武帝時期大臣連番因直諫而獲罪或外遷，反映皇權高漲對大臣直諫構成沉重壓力，直諫之風自然難以形成於光武帝時期。

明帝時期吏化之風盛行，加上皇權持續高漲，臣下對君主作出諫諍更形困難，明帝時期直諫之臣人數下跌正反映此點。《後漢書·鍾離意列傳》云：「帝性褊察，好以耳目隱發為明，故公卿大臣數被詆毀，近臣尚書以下至見提拽。……朝廷莫不悚慄，爭為嚴切，以避誅責；唯意獨敢諫爭，數封還詔書，臣下過失輒救解之。」²³ 文中「朝廷莫不悚慄」之言反映朝臣對君權的臣服，至於鍾離意（生卒年不詳）「獨敢諫爭」則顯示其時朝廷已少有直諫之臣。此外，宋均（?-76）出任尚書令時「恆欲叩頭爭之，以時方嚴切，故遂不敢陳。」²⁴ 直諫之臣宋均因皇權所施加的壓力而未敢進諫，亦反映君權高漲導致直諫之風沉寂。

章帝時期施政雖「務於寬厚」，²⁵ 然在吏化之風未息及皇權持續高漲下，朝廷的諫諍風氣未有明顯改變；這從尚書僕射朱暉（10-89）諫阻章帝復行均輸及置鹽官之法，諸尚書竟「共劾奏暉」以求脫罪一事可得反映。²⁶ 事實上，章帝曾嚴厲批評官吏怯於直諫：「俗吏苟合，阿意面從，進無謇謇之志，卻無退思之念，患之甚久。」²⁷ 文中「無謇謇之志」一語正道出其時官僚中充斥「阿意面從」之徒，而少有勇於直諫者。章帝將直諫者少歸因於「俗吏苟合」，更表明直諫之風沉寂與東漢初期推行吏化政策有著一定程度的關係。²⁸

入至和帝時期，直諫之臣數量增至 17 人，《冊府元龜·諫諍部》亦顯示此時期的直諫數量有所上升，這實與外戚竇憲乘和帝幼立而專權有關。《後漢書·袁安列傳》載章和二年（88）官僚聯合反對竇憲北擊匈奴之議：

后兄車騎將軍憲北擊匈奴，安與太尉宋由、司空任隗及九卿詣朝堂上書

²³ 同前引，卷 41，頁 1409。

²⁴ 同前引，〈宋均列傳〉，頁 1414。

²⁵ 同前引，卷 46，〈陳寵列傳〉，頁 1549。

²⁶ 同前引，卷 43，〈朱暉列傳〉，頁 1461。

²⁷ 同前引，頁 1460。

²⁸ 兩漢文吏以奉行律令法治為依歸，往往被同時期的儒生視為僅遵三尺法行事，為未能盡忠直諫的「俗吏」。然而，兩漢文吏亦有頻繁進諫者，出身文吏世家的陳忠（?-125）便多次向安帝進諫。正如白品鍵所言，兩漢文吏文化表現出一種融會諸家學術的樣貌，儒家之忠信孝慈、道家之恬淡無為均包含在為吏之道中，故文吏未能盡忠直諫可能只是一種刻板的歷史印象。這亦表示東漢前期諫風沉寂，是否確如章帝所言緣於吏化政策的推行，仍有待深入討論。白品鍵，《士與漢代文化搏成研究：儒學、吏事與方術的揉合與實踐》（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研究所博士論文，2014），頁 485-486。

諫，以爲匈奴不犯邊塞，而無故勞師遠涉，損費國用，徼功萬里，非社稷之計。書連上輒寢。宋由懼，遂不敢復署議，而諸卿稍自引止。唯安獨與任隗守正不移，至免冠朝堂固爭者十上。太后不聽，眾皆爲之危懼，安正色自若。²⁹

這是東漢歷史上首次由官僚所發動的集體抗議行動。其時三公九卿等主要官員均共同上書諫諍，袁宏《後漢紀》便有「是時諫者甚眾」之語，³⁰ 可見抗議行動聲勢之浩大。其後竇憲以外戚之寵威傾天下，尚書何敞 (?-105) 上封事批評竇氏成員「不遵法」，尚書僕射樂恢 (?-91) 及鄧壽 (?-89) 更因上疏言諸竇罪過而遭害，³¹ 凡此皆見其時諫風之盛。然而，和帝時期的直諫現象亦不宜被過分誇大。上引〈袁安列傳〉便指出太尉宋由 (?-92) 因「書連上輒寢」而不復署議，諸卿亦逐漸退出諫諍行列，最終只剩袁安 (?-92) 與任隗 (?-92) 持續固爭。此外，河南尹張酺 (?-104) 於竇氏敗後所上之疏，有「方憲等寵貴，羣臣阿附唯恐不及，皆言憲受顧命之託，懷伊、呂之忠，至乃復比鄧夫人於文母」之語，³² 這亦反映和帝時期直諫之臣的數量仍遠低於依附竇氏的阿諛之士。

和帝時期短暫出現的直諫現象於竇氏敗後未延續，這從鄧太后臨朝時期直諫之臣的數量回落至 12 人、以及《冊府元龜·諫諍部》所載此時期諫言數量跌至新低均可得見。樊準 (?-118) 於鄧太后臨朝之初因「儒學陵替」而上奏，疏中便有「博士倚席不講，儒者競論浮麗，忘謇謇之忠，習譏諛之辭」之言，³³ 可見其時少有直諫之儒。事實上，鄧太后臨朝之初曾一度出現官僚聯合抗議行動，〈杜根列傳〉載杜根（生卒年不詳）等郎官上書請求鄧太后歸政安帝：「時和熹鄧后臨朝，權在外戚。根以安帝年長，宜親政事，乃與同時郎上書直諫。太后大怒，收執根等，令盛以縑囊，於殿上撲殺之。」此外，平原郡吏成翊世（生卒年不詳）亦因力諫太后歸政而坐抵罪。³⁴ 然而，從公卿一律於是次諫諍行動中缺席，可知其規模遠不及和帝時期的反竇氏抗議行動。以上史實表明，和帝時期的反竇氏抗議行動只是偶發的歷史事件，且未形成具持續性的直諫風潮。袁宏認為東漢肆直之風的形成緣於和

²⁹ 范曄，《後漢書》，卷 45，頁 1519。

³⁰ 袁宏，《後漢紀校注》，卷 12，〈孝章皇帝紀下〉，頁 360。

³¹ 范曄，《後漢書》，卷 43，〈何敞列傳〉，頁 1484-1486；卷 29，〈鄧壽列傳〉，頁 1033-1034；卷 43，〈樂恢列傳〉，頁 1478-1479。

³² 同前引，卷 45，〈張酺列傳〉，頁 1531。

³³ 同前引，卷 32，〈樊準列傳〉，頁 1126。

³⁴ 同前引，卷 57，頁 1839-1840。

帝時期閹宦專權，然其時直諫之臣的批判對象為外戚而非宦官，加上抗議行動於竇氏敗後已告沉寂，可見袁氏的論述未能準確把握東漢諫風的演變軌跡。

表一及附表的數據顯示，東漢諫風於安帝親政時期出現明顯變化，該四年間直諫次數及直諫之臣的數量均有顯著上升。安帝親政之初曾公車禮聘杜根、成翊世等直諫之臣，又因連有災異而下詔公卿百僚各上封事。尚書陳忠上奏便有「言事者見杜根、成翊世等新蒙表錄，顯列二臺，必承風響應，爭為切直」之語，預言直諫之風將由此而起。³⁵ 其後安帝寵信乳母王聖（生卒年不詳）、外戚耿寶（?-125）及閹顯（?-125）等人，楊震、陳忠、翟酺（生卒年不詳）等官僚遂積極進行諫諍。當中楊震「前後所上，轉有切至，帝既不平之，而樊豐等皆側目憤怨」，最終遭耿寶、樊豐（?-125）等所陷而自殺。³⁶

安帝於延光三年（124）廢太子劉保為濟陰王，太僕來歷（?-133）、太常桓焉（?-143）、廷尉張皓（50-132）等更廣結朝臣抗議：

歷乃要結光祿勳役諷，宗正劉瑋，將作大匠薛皓，侍中閻丘弘、陳光、趙代、施延，太中大夫朱伉、第五頡，中散大夫曹成，諫議大夫李尤，符節令張敬，持書侍御史龔調，羽林右監孔顯，城門司馬徐崇，衛尉守丞樂闡，長樂、未央廄令鄭安世等十餘人，俱詣鴻都門證太子無過。³⁷

來歷連同十餘名官員「詣鴻都門證太子無過」，這是東漢歷史上第三次官僚聯合抗議行動。比較和帝及安帝時期兩次抗議行動，可發現兩點根本分別：一、和帝時期的抗議行動一直針對外戚竇氏而非仍未親政的和帝，故諫言少有批評皇帝的內容。安帝時期的抗議行動，則針對擢用外戚及內寵的安帝而發。二、直諫現象於和帝時期反竇氏抗爭後未延續，反觀安帝時期抗議行動完結後，直諫風潮卻於順帝時期不斷擴大及蔓延，這從表一及附表所呈現的數據可得到充分反映。必須指出，附表所列順帝時期的 26 名直諫之臣，共有 24 人（杜喬（?-147）及滕撫（生卒年不詳）除外）於永建、陽嘉年間已有任職中央的經歷，這表示直諫之臣於順帝即位後的十年間激增。若由鄧太后臨朝結束（121）開始計算，直諫之臣數量於短短 14 年間由 12 人激增至 24 人，其增幅達至一倍。這表示永建、陽嘉時期正是東漢中後期直諫之風形成的關鍵時期。

³⁵ 同前引，卷 46，〈陳忠列傳〉，頁 1556-1557。

³⁶ 同前引，頁 1562-1563；卷 48，〈翟酺列傳〉，頁 1602-1605；卷 54，〈楊震列傳〉，頁 1766。

³⁷ 同前引，卷 15，〈來歷列傳〉，頁 591。

於進一步分析永建、陽嘉時期的直諫風氣之前，宜先就東漢中前期的諫言內容再作分析。如上文所言，明、章時期君權高漲，官僚之諫言甚少直接批判皇帝。至於和帝至鄧太后臨朝期間的兩次抗議行動，主要針對專權的外戚而發，如反對竇憲北擊匈奴、力請鄧太后歸政安帝等，可見天子並非官僚最主要的諫諍對象。至安帝親政後重用內寵，針對皇帝行徑而發的諫言始告增加。然而，此時期的諫言仍少見直接貶斥天子的內容。祝總斌分析尚書僕射陳忠上奏規勸安帝之疏言，指出陳忠本意並非責怪安帝，而在指斥宦官嬖倖和其他尚書弄權；陳忠更將災異頻生歸咎於宦官嬖倖，以減輕安帝的責任；³⁸ 陳忠之諫行正近於《白虎通》的順諫與闕諫。楊震批評宦官持權用事的奏疏，同樣有避免直斥安帝之非的意圖：

臣伏惟陛下以邊境未寧，躬自菲薄，宮殿垣屋傾倚，枝柱而已，無所興造，欲令遠近咸知政化之清流，商邑之翼翼也。而親近倖臣，未崇斷金，驕溢踰法，多請徒士，盛修第舍，賣弄威福。道路譴譟，眾所聞見。地動之變，近在城郭，殆為此發。³⁹

楊震與陳忠同樣將災異頻生的責任歸咎於宦官而非安帝，楊震甚至刻意推許安帝「無所興造」的節儉作風能「令遠近咸知政化之清流」，此舉實欲減輕諫言中對安帝的批評。然而，楊震的諫行畢竟遠較陳忠為激切，其於安帝「顏色不悅」時仍連連進言，堅持「質相其事而諫」，這已近於《白虎通》所謂的指諫與陷諫。⁴⁰ 總括而言，從楊震及陳忠的諫言內容可見，二人雖偶有批評安帝之處，然仍未流露出明顯的貶天子意識。這與下文提及陽嘉以來所出現的貶天子諫風，存在著根本差異。

³⁸ 祝總斌，《兩漢魏晉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頁120-122。

³⁹ 范曄，《後漢書》，卷54，〈楊震列傳〉，頁1765。

⁴⁰ 事實上，楊震於安帝親政時期所樹立的諫諍榜樣，對順帝時期直諫之風的形成發揮著重要作用。《後漢書·楊震列傳》載永建初年朝廷咸稱楊震之忠，順帝遂下詔策曰：「故太尉震，正直是與，俾匡時政，而青蠅點素，同茲在藩」，公開肯定楊震直道事君之行。楊震受到順帝的表彰及推崇，對其時直諫風氣的形成實起著推動作用。舉例而言，司隸校尉虞詡（?-137）於永建元年彈劾中常侍張防（生卒年不詳）時，便有「臣不忍與防同朝，謹自繫以聞，無令臣襲楊震之跡」之言，以楊震的直諫之行自比。此外，楊震故吏杜喬於梁冀專權之時因勇於反抗而慘死獄中，其捨生赴義之舉當亦受楊震影響甚深。金發根於分析東漢黨錮人物時，即將源頭上溯至楊震，可見追索順帝時期的諫風問題，不應忽視楊震的深刻影響。同前引，頁1767；卷58，〈虞詡列傳〉，頁1870-1871；金發根，〈東漢黨錮人物的分析〉，《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34下（臺北：1963），頁507。

三、永建、陽嘉時期直諫之風的分析

本節以分析附表所列 26 名順帝時期直諫之臣的思想背景展開討論。首先需要處理的是：這批官僚勇於直諫，是否受儒家價值觀所影響？直諫並非儒家官僚的專利，如和帝時期的阮隗（生卒年不詳）「少好黃老」、安帝時期的陳忠則出身文史世家，然二人均以好諫顯名。⁴¹ 那順帝時期直諫之臣的思想背景如何？為清楚起見，特製作表二以方便說明：

表二：順帝時期直諫之臣思想背景表

人物	思想背景	出處 ⁴²
郎顗	少傳父業，兼明經典／父學《京氏易》，善風角、星筭、六日七分	卷 30 下，頁 1053
蘇章	負笈追師，不遠萬里	卷 31，頁 1107
桓焉	明經篤行	卷 37，頁 1257
翟酺	四世傳詩。酺好老子，尤善圖緯、天文、歷筭	卷 48，頁 1602
張皓	少游學京師／師司徒魯恭	卷 56，頁 1815；《華陽國志》，卷 10 中，頁 563
張綱	少明經學	卷 56，頁 1816
王龔	束脩厲節，敦樂藝文	卷 56，頁 1820
成翊世	深明道術	卷 57，頁 1840
樂巴	學覽經典	卷 57，頁 1841
虞詡	年十二，能通尚書	卷 58，頁 1865
張衡	通五經，貫六藝	卷 59，頁 1897
周舉	博學洽聞，為儒者所宗	卷 61，頁 2023
李固	負笈追師三輔，學五經，積十餘年。博覽古今，明於風角、星筭、河圖、讖緯	卷 63，頁 2073
杜喬	少為諸生	卷 63，頁 2091
楊倫	師事司徒丁鴻，習古文尚書	卷 79 上，頁 2564

⁴¹ 范曄，《後漢書》，卷 21，〈阮隗列傳〉，頁 753；卷 46，〈陳忠列傳〉，頁 1555。

⁴² 除《華陽國志》特別標示書名，其餘只列卷數及頁數的資料悉數出自《後漢書》。常璩撰，任乃強校注，《華陽國志校補圖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表二所列 15 人為可考出其學術背景者，該 15 人悉數習儒家經典，當中翟酺、郎顗（生卒年不詳）兼具方術背景。至於未列於表二的 11 人中，鄧康 (?-134) 出自南陽新野鄧禹功臣家族，按明帝於永平九年 (66) 「為四姓小侯開立學校，置五經師」，⁴³ 新野鄧氏既得列四侯之列，可推知鄧康曾接受儒學教育。黃瓊 (86-164) 父黃香 (68-122) 「博學經典，究精道術」，⁴⁴ 如是則黃瓊應曾隨父學習儒典。至於左雄 (?-138) 及朱寵（生卒年不詳），前者任尚書令時曾議繕脩太學，又奏徵海內名儒為博士；後者於任潁川太守時「表孝悌儒義」，又選明經有高行者為功曹、主簿。⁴⁵ 根據二人從政之跡，可推知他們亦服膺儒學。至於其餘 7 人（來歷、第五頡（生卒年不詳）、許敬（生卒年不詳）、滕撫、郭虔（生卒年不詳）、龐參 (?-136)、趙騰（生卒年不詳）），則因史料闕如而未能確認其學術取向。順帝時期直諫之臣可考者，悉數曾研習儒經或服膺儒學，可知順帝時期直諫之風的形成主要由這批儒家官僚⁴⁶ 所推動。

順帝時的直諫之臣大多服膺儒學，他們在朝廷推動直諫亦深受傳統儒家「直道」精神所影響。《論語·衛靈公》有「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之語，⁴⁷ 當中直道的實踐並不限於直諫一途，然東漢儒家官僚多將直諫與直道相提並論。光武帝時期的鄧暉（生卒年不詳）便秉承傳統儒家「直道而行」的精神，發出「障君於朝，而不死職以求直，罪也」之言。⁴⁸ 然而，直道精神於東漢前期僅為個別官員所秉持，並未發展成一種由儒家官僚共同推動的直諫風潮。與此相反，順帝時期大批儒家官僚抱持傳統儒家直道理念實踐直諫。如「好刺舉」的虞詡於遺言有「吾事君直道，行己無愧」之語，⁴⁹ 反映其堅持直諫確源自傳統儒家的直道精神。以忠直見稱的龐參被參奏時，段恭（生卒年不詳）曾上疏營救，其疏有「伏見道路行

⁴³ 范曄，《後漢書》，卷 2，〈顯宗孝明帝紀〉，頁 113。

⁴⁴ 同前引，卷 70，〈黃香列傳〉，頁 2614。

⁴⁵ 同前引，卷 61，〈左雄列傳〉，頁 2019-2021；袁宏，《後漢紀校注》，卷 18，〈孝順皇帝紀上〉，頁 495。

⁴⁶ 本文以「儒家官僚」指稱信奉儒家價值的官僚，並不表示這批官僚的直諫行為單單由儒家價值觀所推動。閻步克指出兩漢出現大量兼通儒學與吏事之士，白品鍵亦指出儒學、吏事、方術三者構成漢代文化的主體，當中三者互相滲透及搏成，故漢代的士亦常同時兼有儒生、文吏與方士三種身分。然而，順帝時期的直諫之臣確然受到傳統儒家「直道」精神所影響，故本文仍以「儒家官僚」指稱這批直諫之臣。閻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頁 423-454；白品鍵，《士與漢代文化搏成研究》，頁 484-489。

⁴⁷ 楊伯峻譯注，《論語譯注》（北京：中華書局，1980），卷 15，頁 167。

⁴⁸ 袁宏，《後漢紀校注》，卷 7，〈光武皇帝紀〉，頁 199-200。

⁴⁹ 范曄，《後漢書》，卷 58，〈虞詡列傳〉，頁 1873。

人，農夫織婦，皆曰『太尉龐參，竭忠盡節，徒以直道不能曲心，孤立羣邪之間，自處中傷之地』」之語，⁵⁰ 可知龐參重直諫亦源自儒家「直道而行」的精神。此外，於永建年間出任司徒的許敬「以臧否爲己任，仕於和、安之間，當竇、鄧、閻氏之盛，直道而進，無所屈撓。」⁵¹ 袁宏在此亦將許敬「以臧否爲己任」與儒家的直道精神相提並論。以上三則例子均將直道與直諫並舉，可知順帝時期不少儒家官僚確然視直諫為「直道而行」的重要體現。

永建、陽嘉時期的儒家官僚積極於朝廷推動直諫之風，深深體現於他們積極發起驅逐懈怠三公的行動之中。順帝前期不少位居三公的官僚深受東漢前期懈怠政風所影響，《後漢書·左雄列傳》便有「順帝新立，大臣懈怠，朝多闕政」之言，⁵² 道出大臣多未能盡職。虞詡之疏進一步揭露其時大臣懈怠之況：「臣見方今公卿以下，類多拱默，以樹恩爲賢，盡節爲愚，至相戒曰：『白璧不可爲，容容多後福』」，⁵³ 可見大臣懈怠主要指拱默而未能直諫、樹恩以謀求後福等苟容之行。證之史實，太尉劉熹（生卒年不詳）於安、順之際阿附外戚閻顯，正屬「以樹恩爲賢」的阿諛之輩。⁵⁴ 司徒朱伉（生卒年不詳）則一度拒絕採納周舉（105-149）為孫程（?-132）鳴冤的建議，《後漢書·周舉列傳》詳載其言論：「今詔怒，二尚書已奏其事，吾獨表此，必致罪譴。」⁵⁵ 朱伉為保相位及避罪譴而怯於直諫，一度拒絕為孫程被逐一事而直諫。文中「吾獨表此，必致罪譴」之言，充分反映朱伉視盡節爲愚的想法。

永建、陽嘉時期儒家官僚推動直諫風氣的激切程度，可從司徒朱伉與司空陶敦（生卒年不詳）對此風的抗拒得到反映。《後漢書·虞詡列傳》載虞詡於永建元年連番彈劾外朝大臣及宦官，導致「百官側目，號爲苛刻」，朱伉及陶敦遂共同劾奏虞詡「盛夏多拘繫無辜，爲吏人患」。虞詡上書自訟時有「今州曰任郡，郡曰任縣，更相委遠，百姓怨窮，以苟容爲賢，盡節爲愚。臣所發舉，臧罪非一，二府恐爲臣所奏，遂加誣罪。臣將從史魚死，即以尸諫耳」之言，順帝其後從虞詡之言罷免司空陶敦。⁵⁶ 此事有三點值得注意：一、虞詡連番彈劾大臣引起陶敦及朱伉的共同劾奏，可見他們並不認同虞詡這種切諫直言之作風。二、虞詡明言將追隨春秋

⁵⁰ 同前引，卷 51，〈龐參列傳〉，頁 1691。

⁵¹ 袁宏，《後漢紀校注》，卷 18，〈孝順皇帝紀上〉，頁 497。

⁵² 范曄，《後漢書》，卷 61，頁 2015。

⁵³ 同前引。

⁵⁴ 劉熹於永建元年以阿黨權貴而免職。同前引，卷 6，〈孝順孝沖孝質帝紀〉，頁 252。

⁵⁵ 同前引，卷 61，頁 2024。

⁵⁶ 同前引，卷 58，頁 1870。

時期衛國大夫史魚（生卒年不詳）尸諫衛靈公（540 B.C.-493 B.C.）之行，這反映虞詡之諫屬於「勵志忘生，爲君不避喪身」的陷諫。三、順帝最終支持虞詡並罷免陶敦，反映順帝對直諫風氣的認同。必須指出，朱伥及陶敦並非阿附權貴之徒。朱伥於延光三年曾連同來歷等官員為廢太子事進諫，其於永建元年在周舉遊說下亦願意上表為孫程鳴冤。至於陶敦，渡邊將智認為其即《後漢書·方術列傳》所載於北鄉侯病時與李郃（生卒年不詳）密謀擁立劉保的陶範（生卒年不詳），⁵⁷如是則陶敦亦為敢於用事之吏。然而，二人並不認同虞詡連番彈劾大臣的直諫作風，這正反映順帝前期直諫風氣之激切。

儒家官僚於陽嘉時期持續力斥未能直諫的懈怠三公。郎顗於陽嘉二年上言「今三公皆令色足恭，外厲內荏，以虛事上，無佐國之實」，其後進一步批評三公未盡監督地方郡守施政之責任：「今選舉牧守，委任三府。長吏不良，既咎州郡，州郡有失，豈得不歸責舉者？」⁵⁸郎顗的觀察與虞詡於永建初年的上疏內容相近。虞詡其時上疏痛斥長吏、二千石濫收百姓「義錢」以聚斂，其奏有「元年以來，貧百姓章言長吏受取百萬以上者，匈匈不絕，謫罰吏人至數千萬，而三公、刺史少所舉奏」之言，⁵⁹可知受懈怠政風影響的三公並未負監察地方吏治之責。

周舉、虞詡、郎顗、黃瓊等儒家官僚不單公開批評三公懈怠，更力勸順帝罷免這類未能盡職的官員。郎顗便以司徒劉崎（?-209）未能進賢為由，建議順帝黜之：「自司徒居位，陰陽多謬，久無虛己進賢之策，天下興議，異人同咨。且立春以來，金氣再見，金能勝木，必有兵氣，宜黜司徒以應天意。」⁶⁰順帝未即時採納郎顗之議，周舉遂於翌年再度提出相近建議。周舉先上言「夫五品不訓，責在司徒，有非其位，宜急黜斥」，至面見順帝時再力勸順帝罷黜劉崎：

帝曰：「百官貪汙佞邪者為誰乎？」舉獨對曰：「臣從下州，超備機密，不足以別羣臣。然公卿大臣數有直言者，忠貞也；阿諛苟容者，佞邪也。司徒視事六年，未聞有忠言異謀，愚心在此。」其後以事免司徒

⁵⁷ 渡邊將智，〈後漢順帝の親政とその統治の展開〉，《史滴》，38（東京：2016），頁27。

⁵⁸ 范曄，《後漢書》，卷30下，〈郎顗列傳〉，頁1059、1056。

⁵⁹ 同前引，卷58，〈虞詡列傳〉，頁1872。紙屋正和對安、順之際三公懈怠如何導致地方行政失序有詳盡分析。紙屋正和著，朱海濱譯，《漢代郡縣制的展開》（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6），頁500-503。

⁶⁰ 范曄，《後漢書》，卷30下，〈郎顗列傳〉，頁1064。

劉崎。⁶¹

司徒劉崎視事六年而未能直言，被周舉視為「阿諛苟容者」，順帝最終採納周舉之議罷免劉崎。黃瓊亦曾上疏建議順帝悉數罷退未能輔君濟民的官員：「使近臣儒者參考政事，數見公卿，察問得失。諸無功德者，宜皆斥黜。」⁶² 以上諸例均反映儒家官僚普遍以直言作為判斷官員賢愚的標準，順帝前期諫風之激切於此可見。

順帝前期儒家官僚的批評對象並不限於懈怠三公，未能盡忠直言的新入仕者同樣受到直諫之臣所痛斥。樊英（生卒年不詳）於出仕後未能盡職輔君，便遭受儒家官僚的廣泛批評。樊英於永建二年得順帝「策書備禮，玄纁徵之」，至四年正式出仕，⁶³ 然時人對其出仕後的表現卻深感失望。李固（93-147）力勸黃瓊出仕之函有以下言論：「近魯陽樊君被徵初至，朝廷設壇席，猶待神明。雖無大異，而言行所守無缺。而毀謗布流，應時折減者，豈非觀聽望深，聲名太盛乎？」李固認為樊英出仕後與其他徵聘之士「功業皆無所採」，並不符合儒家官僚對出仕者的基本期望。⁶⁴ 關於此點，《後漢書·方術列傳》亦有觸及：「英初被詔命，僉以爲必不降志，及後應對，又無奇謨深策，談者以爲失望。」⁶⁵ 綜合以上兩段文字，可知樊英於出仕後並無懈怠或阿附權貴等失節之行，李固便形容樊英「言行所守無缺」。然而，樊英仍被同時代儒家官僚批評為未能把握出仕之機，積極透過直言以匡救時俗，如張楷（生卒年不詳）便因樊英「無奇謨深策」而痛斥其「進退無所據」。⁶⁶ 此例頗能反映順帝前期的儒家官僚不單深惡懈怠及阿黨之徒，亦難以容忍未盡力直言的官員。

儒家官僚不單積極推動忠貞直言的激切諫風，更身體力行地實踐直諫之行，賀純（生卒年不詳）「徵拜議郎，數陳災異，上便宜數百事，多見省納」、⁶⁷ 周舉「上書言當世得失，辭甚切正」、左雄「數言事，其辭深切」等皆為顯例。與此同時，儒家官僚亦在朝廷中彼此聲援以推動諫風。事實上，此風於安帝親政時期已逐漸顯露，其時河間人趙騰因詣闕上書陳得失而下獄，楊震隨即上疏營救：「今趙騰所坐激訐謗語爲罪，與手刃犯法有差。乞爲虧除，全騰之命，以誘芻蕘輿人之

⁶¹ 同前引，卷 61，〈周舉列傳〉，頁 2026。

⁶² 同前引，〈黃瓊列傳〉，頁 2033。

⁶³ 同前引，卷 82 上，〈方術列傳〉，頁 2723。

⁶⁴ 同前引，卷 61，〈黃瓊列傳〉，頁 2032。

⁶⁵ 同前引，卷 82 上，頁 2724。

⁶⁶ 同前引。

⁶⁷ 同前引，卷 63，〈李固列傳〉，頁 2082。

言。」⁶⁸ 直道之士互相聲援之事例於順帝前期明顯增加，如趙騰因「上言災變，譏刺朝政」而伏法，張皓即上疏指「騰等雖干上犯法，所言本欲盡忠正諫。如當誅戮，天下杜口，塞諫爭之源，非所以昭德示後也」，結果趙騰得減死罪一等。⁶⁹ 寧陽主簿詣闕訴其縣令之枉，被劾以大逆，尚書僕射虞詡亦致力營救。⁷⁰ 細究楊震及張皓之疏言，可知二人不單致力營救直諫之臣，更期望天子能進一步容納臣下的諫諍，從而使直諫之風得以延續及發展。

順帝前期的儒家官僚亦常互相推舉彼此的直言之行。舉例而言，周舉「上書言當世得失，辭甚切正」，尚書郭虔、應賀（生卒年不詳）遂「共上疏稱舉忠直，欲帝置章御坐，以為規誡」；周舉至陽嘉三年再因左雄所薦而徵拜尚書。⁷¹ 尚書僕射虞詡則推薦以直言顯名的成翊世，又上疏推薦屢上封事、「有忠公節」的左雄進入尚書。⁷² 至於郎顗亦曾上書推許李固「忠貞之操，好是正直，卓冠古人，當世莫及。」⁷³ 直諫之臣互相推薦之風一直延續至順帝後期，如李固曾上疏推許杜喬「學深行直，當世良臣」，勸請順帝加以重用。⁷⁴ 順帝前期直諫之臣彼此推舉的最突出例子，見於《後漢書·左雄列傳》：

及在司隸，又舉故冀州刺史馮直以為將帥，而直嘗坐臧受罪，舉以此劾奏雄。雄悅曰：「吾嘗事馮直之父而又與直善，今宣光以此奏吾，乃是韓厥之舉也。」由是天下服焉。⁷⁵

左雄面對周舉的劾奏不單未動怒，反而推許周舉以直道劾己之舉，可見左雄確然不遺餘力地推動直諫之風。必須指出，順帝前期直道之士互相推許及聲援的現象，為東漢中前期所罕見。光武帝時期鮑永因韓歆事固請而忤帝意，及和帝時期何敞上疏營救因譏刺竇憲而下獄的鄧壽，⁷⁶ 已是東漢中前期官員互相推舉彼此直言之行的僅有例子。這再次表明順帝時期逐漸形成的直諫之風，乃東漢中前期歷史所未見的

⁶⁸ 同前引，卷 54，〈楊震列傳〉，頁 1766。

⁶⁹ 同前引，卷 56，〈張皓列傳〉，頁 1816。

⁷⁰ 同前引，卷 58，〈虞詡列傳〉，頁 1872。

⁷¹ 同前引，卷 61，〈周舉列傳〉，頁 2024-2025。

⁷² 同前引，卷 57，〈杜根列傳〉，頁 1840；卷 61，〈左雄列傳〉，頁 2015。

⁷³ 同前引，卷 30 下，〈郎顗列傳〉，頁 1070。

⁷⁴ 同前引，卷 63，〈李固列傳〉，頁 2081。

⁷⁵ 同前引，卷 61，頁 2022。

⁷⁶ 同前引，卷 29，〈鮑永列傳〉，頁 1020；〈鄧暉列傳〉，頁 1033-1034。

獨特現象。

最後補充順帝對直諫之風的看法，以結束本節討論。順帝於即位初期一直對儒家官僚所推動的直諫之風深表肯定。事實上，順帝對官僚懈怠之風亦深感不滿，其於陽嘉三年便發出「羣司素餐，據非其位」之歎，⁷⁷ 這表示扭轉東漢前期官員的懈怠風氣，為順帝及儒家官僚一致認同的施政目標。順帝於永建年間亦多次納諫及肯定直諫之風，如侍中楊倫因「言切直，辭不遜順」而遭尚書奏「探知密事，激以求直」，順帝下詔以楊倫「數進忠言」而赦其罪。⁷⁸ 此外，《後漢書·張皓列傳》載趙騰「上言災變，譏刺朝政」，原「以誹謗當伏重法」，後張皓上諫規勸勿「塞諫爭之源」，順帝即「減騰死罪一等，餘皆司寇。」⁷⁹ 順帝肯定直諫的態度更得到郎顗推許：「陛下躬親庶事，詔書每下，廣開不諱之路，以天下百姓為憂」。⁸⁰ 由此可見，順帝前期直諫之風得以盛行，乃君臣共同推動的結果。

四、永建時期的政治格局：皇帝與儒家官僚的短暫共治

上節全面介紹永建、陽嘉時期直諫之風的特徵，本節進一步追問：東漢直諫之風為何於永建、陽嘉時期興起？除上文提及楊震作為諫諍榜樣所發揮的刺激作用，還有沒有其他因素促成順帝時期直諫之風的興起？儒家官僚於順帝前期為何具有驅逐懈怠三公的政治能量？要回答以上問題，討論焦點需由諫風討論轉移至永建時期出現的特殊政治格局。

現先從順帝的即位歷程談起。漢順帝劉保為安帝庶長子，於永寧元年（120）被立為皇太子。延光三年閭皇后（?-126）與宦官樊豐、江京（?-125）等共同構陷劉保，安帝不理太常桓焉、太僕來歷、廷尉張皓等官員反對，於同年九月廢劉保為濟陰王。延光四年三月安帝駕崩，閭皇后以太后身分臨朝，擁立濟北王劉壽（?-120）之子北鄉侯劉懿（r. 125）繼位，並安排兄長閭顯出任車騎將軍。同年十月北鄉侯駕崩，以孫程為首的十九名宦官於十一月發動政變誅殺諸閭，並擁立劉保為帝，永建時期的特殊政治格局由此展開。⁸¹

⁷⁷ 同前引，卷 61，〈周舉列傳〉，頁 2025。

⁷⁸ 同前引，卷 79 上，〈儒林列傳〉，頁 2564-2565。

⁷⁹ 同前引，卷 56，頁 1816。

⁸⁰ 袁宏，《後漢紀校注》，卷 18，〈孝順皇帝紀上〉，頁 503。

⁸¹ 關於劉保自永寧元年（120）四月被冊立為皇太子，至延光四年繼承帝位的歷程，狩野直禎有細緻介紹。狩野直禎，《後漢政治史の研究》（京都：同朋舍出版，1993），頁 419-439。

東漢自和帝以來一直出現幼主即位、母后臨朝的政治格局。和帝及北鄉侯即位時竇太后 (?-135 B.C.) 及閻太后相繼臨朝，鄧太后則先後於殤帝 (r. 106) 及安帝時期臨朝。反觀順帝即位時閻氏勢力已遭孫程等宦官所滅，閻太后則「幽在離宮」，徹底喪失影響政局的能力，並於永建元年正月離世。⁸² 至於劉保親母李氏早被閻皇后所毒殺，乳母王男（生卒年不詳）及廚監邴吉 (?-55 B.C.) 於延光三年亦遭王聖、江京、樊豐所害。⁸³ 換言之，順帝為東漢自和帝以來，首位即位時未有太后臨朝及外戚輔政的皇帝。⁸⁴

必須指出，順帝即位之初亦有新野來氏以姻族身分輔政，如來歷於永建元年獲拜為車騎將軍，其弟來祉（生卒年不詳）、來超（生卒年不詳）分別出任步兵校尉及黃門侍郎。⁸⁵ 然而，來歷與竇憲、鄧鸞 (?-121) 等出自太后親族的外戚並不相同，因新野來氏並非順帝的母家成員。來歷之母為明帝女武安公主 (?-128)，來歷之子則尚安帝妹平氏長公主（生卒年不詳），⁸⁶ 可知其屬舂陵劉氏婚姻圈的成員，與順帝的血緣關係不算親密。來氏家族於永建初期得到順帝信任，除緣於其皇族姻親身分，亦與來歷昔日曾反對閻氏將安帝廢為濟陰王有關。永建三年來歷因母薨而稱病歸第，其車騎將軍一職隨之而罷，而來歷在服闋後亦只於外朝出任大鴻臚，未再領將軍之職。⁸⁷ 由此可見，來歷只是永建前期獲順帝特別擢用，以維持宮廷穩定的過渡性人物。⁸⁸

永建前期另一股宮廷中的重要力量，是以孫程為首的宦官。《後漢書·虞詡列傳》載有一段孫程與順帝的對話，頗能反映二人之關係：「陛下始與臣等造事之時，常疾姦臣，知其傾國。」⁸⁹ 文中的姦臣指閻顯、江京等人，如是則「造事之

⁸² 范曄，《後漢書》，卷 61，〈周舉列傳〉，頁 2023；卷 6，〈孝順孝沖孝質帝紀〉，頁 249。

⁸³ 同前引，卷 6，〈孝順孝沖孝質帝紀〉，頁 252。

⁸⁴ 張磊夫早已注意到此一東漢政治史上的特殊政治格局：「此時，這位新皇帝被推上皇位，但朝局處於一種奇特的狀態：無上的權力掌握在一個未加元服的男孩手中，卻沒有人攝政代表他行使大權。」Rafe de Crespigny, *Fire over Luoyang: A History of the Later Han Dynasty, 23-220 AD* (Leiden: Brill, 2017), p. 226. 中譯本見張磊夫著，鄒秋筠譯，《洛陽大火：公元 23-220 年的後漢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23），頁 220。

⁸⁵ 范曄，《後漢書》，卷 15，〈來歷列傳〉，頁 593。

⁸⁶ 同前引。

⁸⁷ 同前引，頁 590-593。

⁸⁸ 渡邊將智指出，順帝除安排「尚主婚家」來歷輔政，亦曾擢用劉氏宗室。孫程發動政變時，劉光以尚書令身分奏請劉保即位，渡邊將智推測其為劉氏宗室成員。然而，劉氏宗室於永建時期未有發揮影響政局的明顯作用，故本文不作詳細討論。渡邊將智，〈後漢順帝的親政とその統治の展開〉，頁 28-29。

⁸⁹ 范曄，《後漢書》，卷 58，頁 1871。

時」很可能指延光四年十月北鄉侯駕崩至十一月孫程發動政變的一段時間。此條史料一方面反映順帝早已得悉孫程將發動宮廷政變，另一方面則反映順帝與孫程等宦者的合作時間短促，這從范曄以「始」字描述二者的合作關係即可得知。事實上，孫程並非原太子宫之近宦。根據《後漢書·宦者列傳》，參與擁立順帝政變的十九名宦官中，只得中黃門王康（生卒年不詳）可確定曾為太子府吏，其因劉保被廢而「常懷歎憤」，⁹⁰至於其餘參與政變的宦官尚未見與順帝有特殊關係。

順帝所真正親附的原太子宫近宦，早於其被貶為濟陰王時已遭王聖、江京驅逐，《後漢書·宦者列傳》「監太子家小黃門籍建、傅高梵、長秋長趙熹、丞良賀、藥長夏珍皆以無過獲罪，建等坐徙朔方」的記載可以為證。⁹¹換言之，以孫程為首的宦官雖於擁立順帝一事立功，然他們與順帝的關係並不如籍建（生卒年不詳）、高梵（生卒年不詳）等原太子宫近宦般親密。順帝即位後迅速重召籍建、高梵等前太子宫成員回京出任中常侍，《後漢書·來歷列傳》便有「籍建、高梵等悉蒙顯擢」之語，⁹²這充分反映順帝對原太子宫近宦的信任。

然而，原太子宫宦官多未有擁立之功，他們與外朝大臣亦缺乏聯繫，這實大大削弱這批近宦於內廷的政治力量。更重要的是，年僅十一歲登基的順帝於即位初期尚未能充分行使皇權，近宦的政治力量遂隨著皇權不彰而大幅萎縮；這從永建元年中常侍張防被驅逐一事可得明證。《後漢書·虞詡列傳》詳載此事本末：

時中常侍張防特用權勢，每請託受取，詡輒案之，而屢寢不報。詡不勝其憤，乃自繫廷尉，奏言曰：「昔孝安皇帝任用樊豐，遂交亂嫡統，幾亡社稷。今者張防復弄威柄，國家之禍將重至矣。臣不忍與防同朝，謹自繫以聞，無令臣襲楊震之跡。」書奏，防流涕訴帝，詡坐論輸左校。……宦者孫程、張賢等知詡以忠獲罪，乃相率奏乞見。程曰：「……司隸校尉虞詡為陛下盡忠，而更被拘繫；常侍張防臧罪明正，反搆忠良。……宜急收防送獄，以塞天變。下詔出詡，還假印綬。」時防立在帝後，程乃叱防曰：「姦臣張防，何不下殿！」防不得已，趨就東箱。程曰：「陛下急收防，無令從阿母求請。」帝問諸尚書，尚書賈朗素與防善，證詡之罪。帝疑焉，謂程曰：「且出，吾方思之。」於是詡

⁹⁰ 同前引，卷 78，頁 2515。

⁹¹ 同前引，頁 2518。

⁹² 同前引，卷 15，頁 593。

子顗與門生百餘人，舉幡候中常侍高梵車，叩頭流血，訴言枉狀。梵乃入言之，防坐徙邊，賈朗等六人或死或黜，即日赦出詔。⁹³

上文透露出三點重要訊息：一、虞詡於奏言中以安帝任用樊豐與順帝擢用張防相提並論，可知張防必為順帝所倚重的近宦。如是則張防得以「特用權執」，其權力實為順帝授予。二、孫程勸順帝釋放虞詡時，竟敢公然於順帝面前叱喝「立在帝後」的張防，而順帝竟未能施加保護，以至張防「趨就東箱」。⁹⁴ 這正反映皇權於其時尚未能完全伸張。三、年幼的順帝雖未能充分行使皇權，然其畢竟掌握著最高的政治權力，故各路人馬需要極力爭取順帝支持，始能維護自身的政治地位及利益。當中孫程催促順帝急收張防，與張防暗結的尚書賈朗（生卒年不詳）則力證虞詡之罪，至於虞詡的兒子及門生則尋求近宦高梵協助，冀能藉高梵的進言以說服順帝赦免虞詡。最終順帝採納高梵建議，作出驅逐張防及賈朗的決定，並即日釋放虞詡。近宦的政治力量既源自皇權，順帝未能充分行使皇權遂使張防最終被孫程及虞詡所驅逐。狩野直禎曾指出順帝即位之初未有外戚輔政，至於宦官則受禮教派儒家官僚所制衡；⁹⁵ 孫程及虞詡共同建議順帝驅逐張防，頗能印證狩野氏之觀察。

上引《後漢書·虞詡列傳》一段文字，同時反映永建前期宦官勢力的分裂。文中提及孫程、張防及高梵三名宦官，顯然並不屬於同一派系。當中孫程及張防關係勢成水火，高梵雖與張防同為順帝近宦，然其最終選擇站於張防的對立面，這反映永建前期的宦官未能團結一致。而在張防勢力倒臺後，高梵亦隨之被逐。《後漢書·天文志》載有張防一黨名單，高梵正屬其中一員：

是時中常侍高梵、張防、將作大匠翟酺、尚書令高堂芝、僕射張敦、尚書尹就、郎姜述、楊鳳等，及兗州刺史鮑就、使匈奴中郎（將）張國、金城太守張篤、敦煌太守張朗，相與交通，漏泄，就、述棄市，梵、防、酺、芝、敦、鳳、就、國皆抵罪。⁹⁶

⁹³ 同前引，卷 58，頁 1870-1871。

⁹⁴ 渡邊將智考出東箱附設於洛陽城北宮正殿中之德陽殿。渡邊將智，〈後漢順帝的親政とその統治の展開〉，頁 30。

⁹⁵ 狩野直禎，《後漢政治史の研究》，頁 437-441。

⁹⁶ 范曄，《後漢書》，卷 11，頁 3243。關於翟酺獲罪之因，《後漢書·翟酺列傳》的記載與《天文志》相異：「順帝即位，拜光祿大夫，遷將作大匠。損省經用，歲息四五千萬。屢因災異，多所匡正。由是權貴共誣酺及尚書令高堂芝等交通屬託，坐減死歸家。」由於史料闕如，暫未能考辨

高梵力勸順帝驅逐張防後，竟因與張防交通而再次被逐出京師。現因史料闕如，已難以確知箇中原委，惟按其時的政治形勢推測，高梵被逐很可能與孫程有關，因這將使孫程成為宮廷中獨大的宦官勢力。然而，孫程其後亦因「爲司隸校尉虞詡訟罪，懷表上殿，呵叱左右」而遭免官，其餘十八名曾參與擁立行動的宦官同告被逐。⁹⁷ 以上分析反映永建前期宦官派系間的傾軋，已導致自身勢力急遽衰退。

在外戚及宦官共同缺席的權力真空下，儒家官僚遂得以於永建時期承擔輔政之重任，成為與順帝共治天下的主要合作伙伴。順帝於永建元年九月採納桓焉之議，「初令三公、尚書入奏事。」⁹⁸ 渡邊將智根據上引〈虞詡列傳〉中尚書賈朗曾於殿中應對順帝的記載，確定其時三公及尚書得進入洛陽城北宮正殿中之德陽殿與順帝議政。⁹⁹ 三公與尚書於永建初期得進入省內辦公，實是太后及戚宦勢力缺席下才可能出現的特殊局面。¹⁰⁰ 若以「儒家官僚與皇帝短暫共治」形容永建時期的政治格局，實不為過。

永建時期「儒家官僚與皇帝短暫共治」的政治格局，於陽嘉二年李固的對策中亦曾提及：

今與陛下共理天下者，外則公卿尚書，內則常侍黃門，譬猶一門之內，一家之事，安則共其福慶，危則通其禍敗。……又宜罷退宦官，去其權重，裁置常侍二人，方直有德者，省事左右；小黃門五人，才智閑雅者，給事殿中。如此，則論者厭塞，升平可致也。¹⁰¹

在此宜先交代李固上策的背景。順帝與儒家官僚共治的政治格局於陽嘉二年已逐漸消失，梁氏外戚集團、乳母宋娥（生卒年不詳）及其黨羽則開始崛起。然而，陽嘉二年畢竟去永建未遠，因此李固仍期盼君臣共治的政治格局能延續下去。李固在對

何說為確。值得注意的是，〈天文志〉提及匈奴中郎將張國、金城太守張篤、敦煌太守張朗與張防、高梵等「相與交通」，以上三人均曾出任西北地區長官，頗疑他們於高梵放逐朔方時與之結交，故受牽連。同前引，卷 48，頁 1605。

⁹⁷ 同前引，卷 78，〈宦者列傳〉，頁 2517。

⁹⁸ 同前引，卷 6，〈孝順孝沖孝質帝紀〉，頁 253；卷 37，〈桓焉列傳〉，頁 1257。

⁹⁹ 渡邊將智，〈後漢順帝の親政とその統治の展開〉，頁 29-30。

¹⁰⁰ 楊鴻年對兩漢宮省制度有精要分析。簡言之，漢代長安的宮內有省，省是君主平居燕處之處，故宮和省之間的界限森嚴以戒備非常；公卿百官若沒有批准，更不得隨意進入省中。三公及尚書於永建初期得入省中，充分反映順帝對儒家官僚的信任。楊鴻年，〈《漢魏制度叢考》〉（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5），頁 1-12。

¹⁰¹ 范曄，〈《後漢書》〉，卷 63，〈李固列傳〉，頁 2076-2077。

策中直言「今與陛下共理天下者，外則公卿尚書，內則常侍黃門」，可見李固亟欲恢復永建初年儒家官僚與順帝共治之局。李固特別提到「常侍黃門」亦屬於共理天下的政治力量，這種認識很可能源自永建初年的實際政治經驗。永建時期宦官禍國未深，儒家官僚與宦官的關係未算緊張，¹⁰² 加上孫程擁立順帝及誅滅閹氏之舉亦為儒家官僚所認同，¹⁰³ 這應是李固認可宦官為「與陛下共理天下者」的重要原因。然而，李固同時建議順帝「罷退宦官，去其權重」，並認定皇帝身邊只需極少數「方直有德」、「才智閑雅」的宦官輔政，這表示出任公卿尚書的儒家官僚，才是與順帝共治天下的主要承擔者。李固的疏言很可能是依據永建時期曾經出現的「儒家官僚與皇帝短暫共治」政治格局，以描繪其理想的升平之道。

關於永建時期君臣共治格局的出現，尚有一關鍵處需要澄清，即順帝即位時年方十一，其是否具備高度的政治謀略，設計出與儒家官僚進行共治的政治布局？換一種說法，順帝作出種種選擇與決策，是否還有其他勢力在背後發揮影響？從順帝於永建元年未能保護近宦張防及高梵之事，已知順帝在用人問題上即使有其個人意向，然在即位初期仍未能完全行使皇權。換言之，永建時期出現的君臣共治政治格局不可能單單出於順帝個人之設計，背後必有其他人物或勢力影響順帝的決策，並協助儒家官僚取得權力。根據永建元年的政治形勢作出推測，來歷及桓焉很可能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

上文提及來歷只是永建前期獲順帝擢用以維持宮廷穩定的過渡性人物，然這並不表示來歷在其時欠缺實質的政治影響力。按來歷於順帝登基後迅即以皇族姻親身分出任衛尉，至永建元年七月更遷任車騎將軍。楊鴻年指出，兩漢宮衛制度以主管宮廷軍隊的衛尉角色最為重要。¹⁰⁴ 東漢前期相繼執政的外戚如馬氏、竇氏和梁氏，均安排親屬出任衛尉一職以鞏固對宮廷的控制。¹⁰⁵ 至於車騎將軍一職，則為馬防、竇憲、鄧騭、閭顯等權重一時的外戚所出任。據此可知，來歷於永建前期很

¹⁰² 舉例而言，周舉於遊說司徒朱伉為孫程等宦官鳴冤時，指出孫程擁立之功使其得與韓信、彭越、吳漢、賈復等功臣並列，這反映部分儒家官僚與孫程曾一度互相聲援及支持。同前引，卷 61，〈周舉列傳〉，頁 2023-2024。

¹⁰³ 《後漢書·方術列傳》載李固父李郃曾密謀擁立順帝：「及北鄉侯病，郃陰與少府河南陶範、步兵校尉趙直謀立順帝，會孫程等事先成，故郃功不顯。」孫程與李郃的政治立場相近，或能解釋李固為何認為宦官同為共治天下者。同前引，卷 82 上，頁 2718。

¹⁰⁴ 楊鴻年，《漢魏制度叢考》，頁 27-31。

¹⁰⁵ 章帝時的馬廖、馬光、竇固、和帝時的竇篤、桓帝時的梁淑均曾出任衛尉。范曄，《後漢書》，卷 7，〈孝桓帝紀〉，頁 305；卷 23，〈竇固列傳〉，頁 811；〈竇憲列傳〉，頁 818；卷 24，〈馬廖列傳〉，頁 853；卷 23，〈馬防列傳〉，頁 856。

可能一度擁有馬氏、竇氏等外戚所掌握的權力，並成為輔助順帝施政的重要人物。來歷之所以深得順帝信任，實因其在延光三年反對廢太子之行動中「獨守闕，連日不肯去」，¹⁰⁶ 為順帝即位前少數堅持聲援順帝的官員。至於桓焉則於順帝立為太子時出任太子少傅，復於反對廢太子的行動中廣泛連結官員參與，¹⁰⁷ 這是其獲得順帝信任的重要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來歷及桓焉本身亦為儒家官僚的一分子，他們於順帝即位後頻繁推薦政治理念相近的直諫之臣出任要職，實屬理所當然之舉。如是則順帝於永建元年二月任命朱寵為太尉、朱伥為司徒，以至提拔虞詡、龐參、左雄等至中央任職，背後很可能源自來歷及桓焉的推薦。事實上，永建元年九月「初令三公、尚書入奏事」之議正由桓焉提出，這已證明桓焉對永建前期儒家官僚勢力的崛起發揮重要作用。換言之，永建時期「儒家官僚與皇帝短暫共治」政治格局之所以出現，實非出自幼主順帝的主動設計，而毋寧是儒家官僚乘太后及戚宦共同缺席之機，成功爭逐權力的結果。而來歷與桓焉二人，則是在背後發揮推動作用的重要人物。¹⁰⁸

在此必須進一步追問：順帝與儒家官僚於永建時期如何進行共治？這種共治模式如何有助直諫之風於朝廷蔓延？現先從順帝時期對直道之士的擢用展開討論。順帝於永建時期起用的直道之士大致可分為三類：一、安帝時期已於中央任職，並於順帝即位後續獲擢用，如桓焉、來歷、張皓、許敬、成翊世、王龔（生卒年不詳）等。這批官員多於順帝昔日被廢為濟陰王時參與抗議行動，至順帝即位後陸續出任三公九卿等要職。如張皓於安帝時歷任尚書僕射及廷尉，至順帝即位後拜為司空；王龔於安帝時期歷任尚書及司隸校尉，順帝即位遷太僕、太常，至永建四年任司空。¹⁰⁹ 二、安帝時期於地方任職，至順帝即位後被提拔至中央任官，如虞詡、龐參、左雄等。三、安帝時期未任顯職或未入仕，至順帝即位後獲重用，如周舉於延光四年辟司徒李郃府、左雄於安帝時期為孝廉，二人均於永建初年獲提拔為尚書。¹¹⁰ 至於李固、黃瓊等則為順帝時期始正式入仕的新官僚。

值得注意的是，上文提及的第二類及第三類官員多於永建、陽嘉年間任職尚書。順帝即位之初的尚書令先後為郭鎮（?-129）及高堂芝（生卒年不詳），尚書中

¹⁰⁶ 同前引，卷 15，〈來歷列傳〉，頁 591-592。

¹⁰⁷ 同前引，卷 37，〈桓焉列傳〉，頁 1257。

¹⁰⁸ 儒家官僚於永建時期得以迅速崛起，亦緣於鄧太后臨朝時期的用儒政策。概言之，鄧太后為扭轉東漢前期崇尚苛刻的吏風，不單著力提拔儒家官僚，又要求各級官員以教化為中心任務。礙於篇幅所限，筆者將另行撰文再作分析。

¹⁰⁹ 范曄，《後漢書》，卷 56，〈張皓列傳〉，頁 1815-1816；〈王龔列傳〉，頁 1820。

¹¹⁰ 同前引，卷 61，〈左雄列傳〉，頁 2015；〈周舉列傳〉，頁 2023。

還有安帝時期已任職的胡廣 (91-172)。¹¹¹ 至永建二年，尚書令高堂芝、僕射張敦（生卒年不詳）、尚書尹就（生卒年不詳）、尚書郎姜述（生卒年不詳）、尚書郎楊鳳 (?-197) 等坐與中常侍張防交通，或棄市或抵罪。隨著大批尚書離任，不少直諫之臣得以進入尚書。如永建二年虞詡出任尚書僕射，至永建三年左雄為尚書令、黃瓊為尚書僕射。於劉保廢為濟陰王時上書言樊豐、王聖「誣罔之狀」的成翊世，亦於永建年間擢為尚書。¹¹² 此外，尚書郭虔、應賀曾上疏稱周舉忠直，「欲帝置章御坐，以為規誡」，這兩位認同直諫風氣的官僚亦於永建年間任職尚書。周舉則於陽嘉三年獲拜為尚書，「與僕射黃瓊同心輔政，名重朝廷，左右憚之」。¹¹³ 以上諸位進入尚書的儒家官僚均為直諫之臣，直諫之風亦由此於朝廷中得以蔓延。

仔細考察永建、陽嘉時期的施政，可發現尚書於朝廷所發揮的影響力遠較三公為大。於順帝前期出任三公者計有朱寵、劉光（生卒年不詳）、龐參、施延（生卒年不詳）、朱伥、許敬、劉崎、黃尚（生卒年不詳）、陶敦、張皓、王龔、孔扶（生卒年不詳）、王卓 (?-137) 13 人，然史籍中罕載這批三公於永建、陽嘉時期的政治活動，可考者僅得朱寵「自為宰相，數抗直言」、¹¹⁴ 龐參「數為左右所陷毀，以所舉用忤帝旨，司隸承風案之」、¹¹⁵ 朱伥於周舉規勸下為孫程鳴冤、¹¹⁶ 張皓「在事多所薦達，天下稱其推士」及替趙騰鳴冤等五事。¹¹⁷ 反觀尚書於永建、陽嘉時期屢屢上疏直言，順帝亦對諸尚書的建議言聽計從。左雄建議順帝採納翟酺修繕太學誘進後學之議、上言推動察舉制度改革、諫議廢撲九卿之習、¹¹⁸ 虞詡上疏廢除長吏及二千石向百姓濫收的「義錢」、¹¹⁹ 黃瓊上疏徵黃錯（生卒年不詳）等處士、勸帝行籍田之禮、¹²⁰ 周舉疏請罷免司徒劉崎、¹²¹ 胡廣連同史敞（生卒年不詳）及郭虔上諫不宜以探籌選定皇后等事，¹²² 順帝均悉數採納，可見任職尚書

¹¹¹ 同前引，卷 44，〈胡廣列傳〉，頁 1505。

¹¹² 同前引，卷 57，〈杜根列傳〉，頁 1840。

¹¹³ 同前引，卷 61，〈周舉列傳〉，頁 2025。

¹¹⁴ 袁宏，《後漢紀校注》，卷 18，〈孝順皇帝紀上〉，頁 497。

¹¹⁵ 范曄，《後漢書》，卷 51，〈龐參列傳〉，頁 1691。

¹¹⁶ 同前引，卷 61，〈周舉列傳〉，頁 2023-2024。

¹¹⁷ 同前引，卷 56，〈張皓列傳〉，頁 1816。此外，王龔曾「深疾宦官專權，志在匡正，乃上書極言其狀，請加放斥」，然此為永和元年事，故不列入。同前引，〈王龔列傳〉，頁 1820。

¹¹⁸ 同前引，卷 61，〈左雄列傳〉，頁 2019-2022。

¹¹⁹ 同前引，卷 58，〈虞詡列傳〉，頁 1872。

¹²⁰ 同前引，卷 61，〈黃瓊列傳〉，頁 2033-2035。

¹²¹ 同前引，〈周舉列傳〉，頁 2025-2026。

¹²² 同前引，卷 44，〈胡廣列傳〉，頁 1505。

的儒家官僚正是與順帝進行共治的核心人物。¹²³ 李固於陽嘉二年的對策中甚至認為尚書已成為天子的喉舌之官：「今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也。斗為天喉舌，尚書亦為陛下喉舌。斗斟酌元氣，運平四時。尚書出納王命，賦政四海，權尊勢重，責之所歸。」¹²⁴ 李固將尚書而非三公視為「北斗」，並認定尚書「出納王命，賦政四海」，這應是根據永建、陽嘉時期尚書權力上升的政治實況所作出的描述。

尚書於順帝前期獲得重用，同時表示三公權力遭受侵奪。陽嘉元年尚書令左雄建議推行察舉制度改革，其時尚書僕射胡廣、尚書郭虔及史敞上疏提出反對意見，認為順帝不應僅依左雄一臣之言推行大規模的選舉改革：

「今以一臣之言，剋戾舊章，便利未明，眾心不厭。矯枉變常，政之所重，而不訪台司，不謀卿士。……臣愚以為可宣下百官，參其同異，然後覽擇勝否，詳採厥衷。敢以瞽言，冒干天禁，惟陛下納焉。」帝不從。¹²⁵

胡廣等於尚書內部發起的議論，最終未能說服順帝將左雄的改革方案「宣下百官」。順帝「不訪台司、不謀卿士」，以尚書令左雄一臣之言即決議推行陽嘉新制，此例反映尚書於永建、陽嘉時期受到重用，同時有削弱三公權力的效果。

事實上，時人已洞察到三公權力於永建、陽嘉時期日漸下降，《後漢紀·順帝紀》載陽嘉元年郎顗之奏便透露相關訊息：「陛下躬親庶事，詔書每下，廣開不諱之路，以天下為憂，百姓為念，而不數見公卿，責以政事，誠優游養德之道也。」¹²⁶ 順帝「躬親庶事」指其通過內朝尚書以決事，「不數見公卿，責以政事」則反映三公虛化的事實。¹²⁷ 儒家官僚於順帝前期大批進入尚書，同時侵奪外

¹²³ 順帝亦有不納尚書建議之例：左雄與僕射郭虔曾共上疏，以為「寇賊連年，死亡太半，一人犯法，舉宗羣亡。宜及其尚微，開令改悔。若告黨與者，聽除其罪；能誅斬者，明加其賞」，然順帝並沒有接納。同前引，卷 61，〈左雄列傳〉，頁 2019。

¹²⁴ 同前引，卷 63，〈李固列傳〉，頁 2076。

¹²⁵ 同前引，卷 44，〈胡廣列傳〉，頁 1506-1507。

¹²⁶ 袁宏，《後漢紀校注》，卷 18，〈孝順皇帝紀上〉，頁 503。

¹²⁷ 三公權力於順帝時期被削，亦體現於朝廷屢以災異為由罷免三公。影山輝國遍尋東漢史籍，指出順帝時期以災異為由遭罷免的三公包括司徒李郃、太尉劉光、司徒張皓、司空王龔、太尉龐參、司徒劉愷（?-124）、司空孔扶、司徒黃尚、太尉桓焉、司徒劉壽等十人，當中前七人均於永建、陽嘉年間被罷免。影山輝國，〈漢代における災異と政治—宰相の災異責任を中心に—〉，《史學雜誌》，90.8（東京：1981），頁 1260-1261。

朝三公部分權力，這表示在順帝前期「儒家官僚與皇帝短暫共治」的政治格局下，任職尚書的儒家官僚所發揮的政治作用遠較三公為大，這亦解釋了史籍為何罕載三公於順帝前期的政治活動。¹²⁸

儒家官僚於順帝前期得以與皇帝共治天下，已讓他們看到進一步重建文化及政治秩序的可能，因此儒家官僚一直高度肯定永建時期的政治。李固於陽嘉二年的對策有「既拔自困殆，龍興即位，天下喁喁，屬望風政」之言，其對梁商 (?-141) 的奏記亦有「朝廷初立，頗存清靜」之語，¹²⁹ 以上言論均表達出李固對永建時期政治的認可。此外，周舉於永和六年 (141) 面見順帝時有「陛下初立，遵脩舊典，興化致政，遠近肅然」之言，皇甫規亦有「伏惟孝順皇帝，初勤王政，紀綱四方，幾以獲安」之觀察。¹³⁰ 李固、周舉及皇甫規均推許永建時期的政治，甚至認為治世於其時幾近出現，可見儒家官僚對永建施政的普遍肯定。

永建時期的政治亦得到范曄推崇，其於《後漢書·黃瓊列傳》論曰部分正面肯定順帝即位初期的統治：「順帝始以童弱反政，而號令自出，知能任使，故士得用情，天下喁喁仰其風采。」¹³¹ 范曄指出順帝即位時得以「號令自出」，這實源於太后、外戚及宦官勢力的缺席及萎縮，「知能任使」則指儒家官僚獲擢用並與順帝進行共治，儒家官僚遂得以直接影響君主決策而少有隔閡；「天下喁喁仰其風采」則反映時人對這種特殊政治格局的肯定。東漢儒家官僚一直認為君主用賢是衡量治世出現的重要標準，因這是漢儒得以變化風俗、重建文化及政治秩序的先決條

¹²⁸ 在此宜就永建時期三公及尚書的關係作出補充。尚書權力提升雖同時帶來抑制三公的效果，然這並不表示順帝或儒家官僚有以尚書制三公的強烈意圖。首先，儒家官僚所欲驅逐的只是懈怠的三公，至於許敬、張皓、龐參、王龔等曾任三公的直諫之臣，則不在驅逐之列。據此可知儒家官僚所針對的只是個別未能盡職的高官，而非一切出任三公之人。此外，上文提及胡廣、郭虔等曾反對順帝僅依左雄之言即推動察舉改革，當中郭虔亦為直諫之臣；這例反映任職尚書的儒家官僚不一定懷有抑制三公權力的意圖。事實上，永建時期敢於直言及任事的儒家官僚，多為上文所提及的第二及第三類直道之士。這批儒家官僚任官資歷尚淺，尚未具備任職三公的資格，故主要透過進入尚書的方式以影響順帝施政，並乘君臣共治之機改造政治文化。至於順帝於即位初期尚未受新興戚宦所左右，其在儒家官僚的推動及感染下，或亦懷有勵精圖治之志，故願意擢用更多具魄力及理念的儒家官僚進入尚書以協助施政。換言之，永建時期三公權力下降很可能只是尚書獲重用的客觀效果，這並不表示順帝或儒家官僚懷有強烈的抑制三公意圖。關於東漢時期尚書權力及地位的演變，學界已有豐富討論，詳參嚴耕望，《中國政治制度史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頁 72-75；陳啟雲，《儒學與漢代歷史文化：陳啟雲文集二》（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略論兩漢樞機職事與三臺制度之發展〉，頁 215-247；祝總斌，《兩漢魏晉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頁 101-126。

¹²⁹ 范曄，《後漢書》，卷 63，〈李固列傳〉，頁 2074、2078。

¹³⁰ 同前引，卷 61，〈周舉列傳〉，頁 2029；卷 65，〈皇甫規列傳〉，頁 2130。

¹³¹ 同前引，卷 61，頁 2042。

件。¹³² 儒家官僚於永建時期得以開創與皇帝共治的政治格局，使忠貞之士透過進入尚書以推動直諫之風，難怪永建時期的政治局面廣為儒家官僚及後世史家所認可。

現重新回到東漢諫風變遷的討論。順帝於永建時期戚宦缺席的情況下得以「號令自出」，儒家官僚則乘順帝幼立的契機得以與皇帝共治天下。其時儒家官僚普遍認為順帝用賢之舉已逼近漢儒所期盼的升平之世，並在順帝的支持下積極推動直諫之風，以求進一步澄清吏治。建基於以上認識，現可進一步檢討袁宏及范曄對東漢直諫之風形成所作出的論述。若將焦點放於桓、靈時期直諫之風的擴散階段，袁、范二氏主張肆直或倖直風氣由宦官干政所引發，誠然為確鑿之論。然而，若聚焦於順帝前期直諫之風的形成階段，當可發現范、袁之論述仍有商榷餘地。順帝前期的直諫之風出現，實上承安帝親政時期儒家官僚所發起的抗議行動而來，此風於永建時期藉君臣的共同推動而正式形成。永建時期並無嚴重宦禍，其時的統治亦在儒家官僚的輔助下「幾以獲安」，這反映東漢諫風的興起並非如袁、范二氏所言全由宦官亂政所引發。袁、范二氏僅將東漢晚期直諫風氣的形成歸於宦官亂政此單一因素，明顯忽視了東漢諫風的形成還有永建時期君臣共同推動此一重要原因。

五、陽嘉時期諫風的新發展與漢末政治文化的變遷

永建時期的儒家官僚在與皇帝共治的政治格局下，成功將直諫風氣注入朝廷，並使東漢政治文化出現變化。然而，隨著新興戚宦勢力於陽嘉時期崛起，儒家官僚與皇帝共治之局逐漸動搖。入至永和時期，戚宦干政重新成為政治常態，君臣共治的政治格局正式宣告結束。順帝重用戚宦對東漢諫風發展帶來深遠影響，儒家官僚的諫言開始帶有明顯的貶天子意識，此風至桓、靈時期更被黨錮之士所繼承；這表示漢末清流「依仁蹈義，舍命不渝」的精神，可於順帝前期的政治文化中找到源頭。

現先介紹戚宦勢力自陽嘉以來重新崛起的過程。陽嘉時期崛起的外戚勢力以梁氏最為顯赫。順帝早於永建三年已選梁商女及妹入掖庭，梁商因此得擢為侍中、屯騎校尉。順帝於陽嘉元年冊立梁商女為皇后、梁商妹為貴人，梁商獲擢為執金吾，

¹³² 甘懷真指出漢儒眼中的禮制改革可區分為兩大層面，一是建立天子禮儀，二是儒者掌控官僚機構，並借官職以推動教化，當中後者正是天子化俗的重要手段。甘懷真，《皇權、禮儀與經典詮釋：中國古代政治史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頁 60-65。

此為外戚梁氏勢力正式崛起之始。¹³³ 至於竇氏、耿氏等統治集團中的重要家族，亦因成員被立為貴人而得於內朝任職，如竇章 (?-144) 被擢為羽林郎將、耿寔（生卒年不詳）為侍中、耿恒（生卒年不詳）為羽林中郎將。¹³⁴ 至陽嘉四年梁商獲拜為大將軍，梁氏遂正式成為朝廷中勢力最大的外戚家族。

於陽嘉時期崛起的還有內朝宦官及乳母宋娥等勢力。順帝於陽嘉四年「詔宦官養子悉聽得為後，襲封爵，定著乎令」，¹³⁵ 此舉標誌著宦官地位於順帝時期重新崛起。至於乳母宋娥，〈左雄列傳〉有「初，帝廢為濟陰王，乳母宋娥與黃門孫程等共議立帝，帝後以娥前有謀，遂封為山陽君，邑五千戶」之記載，左雄為此曾三度進諫力勸順帝不宜廣封內寵，然「帝戀戀不能已，卒封之。」¹³⁶ 以上諸例均反映陽嘉時期的順帝於重用戚宦一事上，已與儒家官僚漸行漸遠。《後漢書·張綱列傳》「順帝委縱宦官，有識危心」及〈張衡列傳〉「政事漸損，權移於下」之言，¹³⁷ 更反映儒家官僚與皇帝共治之局於陽嘉時期已漸告消失。

由此可見，儒家官僚於永建時期一度取得與皇帝共治的資格，畢竟只是戚宦勢力偶然缺席下所出現的特殊格面。隨著順帝於陽嘉時期元服及戚宦勢力重新崛起，儒家官僚亦逐漸失去與皇帝共治的機會。換言之，永建時期出現的短暫君臣共治，既非東晉時期門閥士族與皇帝「共天下」的政治格局，亦非宋代君臣雙方均共同承認士可直接參與國家事務的共治模式。田餘慶筆下的東晉門閥政治，士族勢力得以長期平行甚至超越皇權。¹³⁸ 余英時則指出宋代「以天下為己任」的精神涵蘊士對國家事務有著直接參與的資格，這種資格不單為士大夫所自覺，亦同時得到皇帝肯定。¹³⁹ 反觀永建時期儒家官僚之所以獲得與皇帝短暫共治之機，僅源於內朝一度出現的短暫權力真空。這表明永建時期儒家官僚與順帝的共治，其權力結構並未如東晉及宋代般具有足夠的延續性及穩定性。

戚宦勢力於陽嘉時期重新崛起，不單逐漸終結永建時期儒家官僚與皇帝短暫共治之局，更阻礙儒家官僚於朝廷進行文化及政治秩序的重建工作。《後漢書·楊厚

¹³³ 范曄，《後漢書》，卷 34，〈梁商列傳〉，頁 1175。

¹³⁴ 同前引，卷 23，〈竇章列傳〉，頁 822；卷 19，〈耿弇列傳〉，頁 714。

¹³⁵ 同前引，卷 78，〈宦者列傳〉，頁 2518。

¹³⁶ 同前引，卷 61，頁 2021-2022。

¹³⁷ 同前引，卷 56，頁 1817；卷 59，頁 1910。

¹³⁸ 田餘慶，《東晉門閥政治》（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頁 337。

¹³⁹ 余英時，《朱熹的歷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北京：三聯書店，2004），頁 210-230。

列傳》載「每有災異，厚輒上消救之法，而閹宦專政，言不得信」，¹⁴⁰ 正反映宦官勢力崛起不利於儒家官僚輔君濟民。左雄於永建年間曾力勸順帝下旨地方守相長吏「勿使移徙，非父母喪不得去官」，其建議最初得到順帝採納，然最終因宦官阻撓而未能貫徹推行，〈左雄列傳〉中「雄之所言，皆明達政體，而宦豎擅權，終不能用」之語可以為證。¹⁴¹ 李固於永和時期曾發出以下感歎：「朝廷初立，頗存清靜，未能數年，稍復墮損。左右黨進者，日有遷拜，守死善道者，滯滯窮路，而未有改敝立德之方。」¹⁴² 文中「左右黨進者，日有遷拜」正指依附戚宦而入仕的貪官劣吏。在順帝持續任用戚宦輔政、以及與儒家官僚隔閡漸增的情況下，儒家官僚於直諫中的批判對象亦由懈怠三公逐漸轉向用佞的順帝，而陽嘉時期以來的諫風甚至開始帶有明顯的貶天子意識。

儒家官僚自陽嘉時期起，開始針對天子用佞作出激切直諫。張綱 (98-143) 見順帝「委縱宦官」，曾上書直斥順帝之非：「而頃者以來，不遵舊典，無功小人皆有官爵，富之驕之而復害之，非愛人重器，承天順道者也。伏願陛下少留聖思，割損左右，以奉天心。」¹⁴³ 張綱在此將「無功小人皆有官爵」之責任全歸順帝，而其勸請順帝「割損左右，以奉天心」之言，更暗示順帝重用「無功小人」乃逆天之舉。李固亦曾上疏嚴厲批評順帝的用人政策：「自頃以來，漸更陵遲，諸侍中皆膏粱之餘，勢家子弟，無宿德名儒可顧問者。愚以為瓊等久處郎署，已且十年。誠恨陛下隆崇於始，而棄之於末也。」¹⁴⁴ 從「誠恨陛下隆崇於始，而棄之於末也」之言，可見李固亦將「漸更陵遲」的責任歸之於順帝的用人不當。

陽嘉時期以來，儒家官僚的直諫不單針對順帝而發，其諫言更開始帶有頗為明顯的貶天子內容。順帝於陽嘉三年因災異頻生下詔群臣上言，周舉於疏中便將災異頻生的部分責任歸於順帝失德：「陛下處唐虞之位，未行堯舜之政，近廢文帝、光武之法，而循亡秦奢侈之欲，內積怨女，外有曠夫」。周舉其後又直斥順帝未立東宮為「傷和逆理，斷絕人倫」之舉。¹⁴⁵ 周舉將順帝的施政類比為「循亡秦奢侈之欲」，更將順帝視為等同秦主的暴君。順帝於漢安年間 (142-144) 封梁冀子弟五人及中常侍為侯，杜喬亦有激切的貶天子之諫：「臣聞古之明君，褒罰必以功過；末

¹⁴⁰ 范曄，《後漢書》，卷 30 上，頁 1049。

¹⁴¹ 同前引，卷 61，頁 2018-2019。

¹⁴² 同前引，卷 63，〈李固列傳〉，頁 2078。

¹⁴³ 同前引，卷 56，〈張綱列傳〉，頁 1817。

¹⁴⁴ 袁宏，《後漢紀校注》，卷 19，〈孝順皇帝紀下〉，頁 536。

¹⁴⁵ 范曄，《後漢書》，卷 61，〈周舉列傳〉，頁 2025。

世闇主，誅賞各緣其私。今梁氏一門，宦者微孽，並帶無功之紱，裂勞臣之土，其爲乖濫，胡可勝言！……苟遂斯道，豈伊傷政，爲亂而已，喪身亡國，可不慎哉！」¹⁴⁶ 杜喬於諫言中同樣直斥順帝爲「末世闇主」，並認定順帝重用外戚梁氏爲「喪身亡國」之舉。周舉、杜喬公然直斥順帝之非，又貶抑順帝爲亡國之君，其諫言具有明顯的貶天子意識，爲東漢中前期歷史中所罕見，這表示諫風於陽嘉時期已出現突破性發展。忠言直諫既作爲儒家官僚實踐直道的重要體現，他們於天子失德時遂透過直言天子之非，嘗試重建政治及文化秩序。然而，由於儒家官僚的直諫帶有強烈的貶天子意味，這同時使陽嘉以來的君臣關係日趨緊張。

當然，杜喬與周舉這種帶有高度貶天子意識的直諫，於順帝時期仍未普遍，故不宜誇大這種激切直諫於桓、靈之前的普及程度。然而，這種直斥天子爲暴君或亡國之主的激切之諫，確然首見於順帝重用戚宦之後，這表示漢末肆直或倖直的諫風早於桓、靈之前已開始出現。順帝時期儒家官僚直諫的激切程度確實遠不及桓、靈時期，如其時仍未形成太學生清議，亦未見有儒家官僚採用李雲露布諫帝之形式公開批評天子之失。然若從諫言內容考察，卻不得不承認桓、靈時期黨錮之士集體「汙穢朝廷」，以至清流集團對君主、宦官及其黨羽作出激烈批判，均上承自順帝時期逐漸萌芽的直諫之風。舉例而言，《後漢書·黨錮列傳》提到第一次黨錮之禍後太學生對朝廷公卿的批評：「渤海公族進階、扶風魏齊卿，並危言深論，不隱豪強。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議，屣履到門。」李賢注「危言」爲「不畏危難而直言」，¹⁴⁷ 而這種直言批評公卿的行動，正上承永建時期儒家官僚痛斥懈怠三公的直道精神而來。至於陳蕃等黨錮領袖對天子連番上疏以直斥其非，亦與周舉、杜喬等的直諫表現相近。如是則漢末出現的君臣關係危機，可於順帝時期的肆直和倖直諫風中找到其思想源頭。¹⁴⁸ 換言之，順帝時期確然爲東漢晚年政治文化出現劇變的發軔時期。

還有一點值得注意，即永建時期儒家官僚以忠貞直言作爲區分官員賢愚正邪的準則，已隱然透露出漢末清流與濁流的對立意識。余英時認為東漢後期士之群體自覺的出現，是由士大夫集團與外戚宦官勢力的激烈鬥爭所激起；而桓帝時期則爲士人群體自覺趨於成熟的關鍵時期，士大夫之形成清流集團正肇端於此際。¹⁴⁹ 然

¹⁴⁶ 同前引，卷 63，〈杜喬列傳〉，頁 2092。

¹⁴⁷ 同前引，卷 67，頁 2186-2187。

¹⁴⁸ 余英時對漢末名教危機中的君臣關係危機曾作出深刻分析。余英時，《中國知識階層史論》，〈名教危機與魏晉士風的演變〉，頁 332-336。

¹⁴⁹ 同前引，〈漢晉之際士之新自覺與新思潮〉，頁 206-230。

而，本文的分析可證，士人的群體自覺於順帝前期已逐漸出現。順帝前期的直道之士一方面彼此聲援，一方面對懈怠者加以驅逐，其區分忠奸的標準正是直言與苟容，如周舉便曾向順帝發出「公卿大臣數有直言者，忠貞也；阿諛苟容者，佞邪也」之言。¹⁵⁰ 周舉以忠貞及苟容區別人己，這已相當接近余英時提及於漢末出現的士人群體自覺。此外，川勝義雄研究漢末清濁二流的對立，認為清流勢力的結構可作如下理解：

在政治上依據共通的儒家國家理念，在個人交際上依靠共通的儒家道德感情形成了廣泛的輿論，以此確定代表者，互相取得聯絡。具備這種結構的清流勢力有其自身的原理，是一個有聯絡有組織的統一體。¹⁵¹

順帝前期直道之士宣揚忠貞直諫之風，並致力將懈怠苟容者驅逐，這與漢末清流依據共通的儒家價值基準進行人物評價，並對歪曲君主權力、擾亂國家正常狀態的濁流勢力採取反對立場，二者的信念與行事模式無異已十分接近。這表示漢末黨錮之士「澄清天下」的精神，實上承自順帝前期儒家官僚所開創的直諫之風。

最後再次引錄范曄於《後漢書·黨錮列傳》關於漢末倬直之風的討論，以結束本節討論。范曄這樣描述漢末倬直之風：「逮桓靈之間，主荒政繆，國命委於閹寺，士子羞與爲伍，故匹夫抗憤，處士橫議，遂乃激揚名聲，互相題拂，品覈公卿，裁量執政，倬直之風，於斯行矣。」文中「激揚名聲，互相題拂」之言正是對倬直之風所作的具體描述。細察永建、陽嘉時期的直諫之風，儒家官僚互相推舉彼此的直諫之行，正與漢末黨錮之士「激揚名聲，互相題拂」的行徑相近。當然，順帝前期的直道之士雖彼此聲援，惟於組織及人數上均遠未達到桓、靈時期黨錮之士的高度。漢末清流主要通過師友及門生故吏等關係而結合，太學則成為黨錮之士互相連結、製造輿論的重要場所。¹⁵² 反觀順帝前期的直道之士雖互相聲援，然仍未發展出桓、靈時期那樣高度組織化的人際關係網絡。此外，直諫之風於順帝前期僅局限於在朝廷散播，並未如桓、靈時期已向太學以至民間大規模擴散，故永建、陽嘉時期並未出現漢末「匹夫抗憤，處士橫議」的現象。以上分析均表示，桓帝時期確如余英時所言始為士人群體自覺趨於成熟的時期。然而，漢末黨錮之士敢於「品

¹⁵⁰ 范曄，《後漢書》，卷 61，〈周舉列傳〉，頁 2026。

¹⁵¹ 川勝義雄著，徐谷梵、李濟滄譯，《六朝貴族制社會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貴族制社會的形成〉，頁 12-13。

¹⁵² 同前引，頁 6-13。

覈公卿，裁量執政」，則與永建時期儒家官僚透過直言批評懈怠三公的行徑相似。若接受范曄對婞直之風的定義，則永建、陽嘉時期儒家官僚所開創的新士風，確然可視為直諫之風興起的源頭；而桓、靈之際士人群體自覺的根源，亦可上溯至永建、陽嘉時期儒家官僚所開創的直諫及互相聲援之風。

六、總結

綜上所論，東漢肆直及婞直之風的興起與形成，並非如袁宏、范曄所述般僅為宦官亂政下的產物。東漢直諫之風的興起，最早可追溯至安帝親政後所引發的抗議運動。入至永建時期，太后臨朝之局未出現，加上戚宦勢力急遽衰退，儒家官僚遂乘朝廷出現短暫權力真空之機，開創與順帝共治之政治格局，並在朝廷積極推動直諫之風。入至陽嘉時期，順帝開始重用戚宦輔政，君臣共治之局逐漸消失，儒家官僚的直諫亦改為針對順帝用佞而發，諫言內容開始帶有明顯的貶天子意識，這不單導致君臣關係漸趨緊張，更埋下桓帝時期儒家官僚集體「汙穢朝廷」的種子。永建時期皇帝與儒家官僚共治之局雖然短暫，然儒家官僚推動直諫不單一改東漢前期大臣懈怠之風，更下開桓、靈時期黨錮之士「依仁蹈義，舍命不渝」的精神。另一方面，儒家官僚秉持以直諫為忠貞的信念，並以此作為區分官員清濁的界線，這表示士人的群體自覺早於永建時期已開始萌芽。由此可見，順帝永建、陽嘉時期實為東漢政治文化發生巨變的重要時期。

附表：東漢中前期直諫之臣表

皇帝	人物	直諫形容及表現	出處 ¹⁵³
光武帝	段襄	骨鯁可任	卷 15，頁 589
	賈復	爲人剛毅方直	卷 17，頁 667
	銚期	其有不得於心，必犯顏諫諍	卷 20，頁 733
	朱祐	爲人質直	卷 22，頁 770
	宋弘	威容德器，羣臣莫及／弘當讌見，御坐新屏風，圖畫列女，帝數顧視之。弘正容言曰：「未見好德如好色者。」	卷 26，頁 904-905、904
	宋嵩	以剛彊孝烈著名	卷 26，頁 905
	董宣	直道不顧，干主討姦	卷 26，頁 907
	韓歆	好直言，無隱諱	卷 26，頁 902
	張湛	光武臨朝，或有愠容，湛輒陳諫其失	卷 27，頁 929
	鮑永	韓歆坐事，永固請之不得，以此忤帝意／雖剛直不及永，猶其風也	卷 29，頁 1020； 《後漢紀》，卷 11，頁 325
	鄧曄	障君於朝，既有其直，而不死職，罪也／帝嘗出獵，車駕夜還，曄拒關不開。……明日，曄上書諫曰……	卷 29，頁 1029、1031
	陰興	有周昌之直	卷 32，頁 1132
	張佚	知其直有餘	卷 37，頁 1254
	戴憑	不能以尸伏諫，偷生苟活，誠慙聖朝	卷 79 上，頁 2553
	陳元	〔歐陽〕歛掾陳元上書追訟之，言甚切至	卷 79 上，頁 2556
	郭憲	當車拔佩刀以斷車鞵；伏地稱眩瞶，不復言	卷 82 上，頁 2709
	鮑恢	恢亦抗直	《後漢紀》，卷 6，頁 164
	申屠剛	抗直之士／謇謇多直言，無所屈撓	《後漢紀》，卷 7，頁 205
	鮑昱	雖剛直不及永，猶其風也	《後漢紀》，卷 11，頁 325
明帝	鮑昱	（見上）	

¹⁵³ 除《後漢紀》特別標示書名，其餘只列卷數及頁數的資料悉數出自《後漢書》。

皇帝	人物	直諫形容及表現	出處
	阮隗	鯁言直議，無所回隱	卷 21，頁 754
	郭丹	在朝廉直公正	卷 27，頁 941
	承宮	數納忠言，……論議切慤	卷 27，頁 945
	鄭弘	負鈇鎖，詣闕上章，為貶訟罪／病篤，上書陳謝，并言竇憲之短	卷 33，頁 1155、1157
	鄭眾	帝不聽，眾不得已，既行，在路連上書固爭之	卷 36，頁 1225
	鍾離意	獨敢諫爭，數封還詔書，臣下過失輒解救之	卷 41，頁 1409
	宋均	若畏威失正，均雖死，不易志／帝善其不撓	卷 41，頁 1413
	寒朗	寒朗之廷爭冤獄，篤矣乎	卷 41，頁 1418
	袁安	引義雅正，可謂王臣之烈	卷 45，頁 1527
	張酺	為人質直，……數有匡正之辭，以嚴見憚	卷 45，頁 1529
	周澤	果敢直言，數有據爭	卷 79 下，頁 2578
	孫堪	果於從政，數有直言	卷 79 下，頁 2579
	樊豐	立朝居正，多所匡諫	《後漢紀》，卷 10，頁 271
章帝	鮑昱	(見上)	
	阮隗		
	鄭弘		
	鄭眾		
	寒朗		
	袁安		
	張酺		
	郅壽	因朝會譏刺憲等，厲音正色，辭旨甚切	卷 29，頁 1033
	第五倫	峭直／言事無所依違	卷 41，頁 1399、1401
	宋意	意以為人臣有節，不宜踰禮過恩，乃上疏課諫曰……／隨違舉奏，無所回避，由是與竇氏有隙	卷 41，頁 1414、1416
	朱暉	彊直自遂	卷 43，頁 1459
	何敞	論議高，常引大體，多所匡正／數切諫	卷 43，頁 1480、1486
	韓棱	竇太后怒，以切責棱，棱固執其議	卷 45，頁 1535
	楊終	博達忠直	卷 48，頁 1601

皇帝	人物	直諫形容及表現	出處
和帝	阮隗	(見上)	
	邳壽		
	宋意		
	寒朗		
	朱暉		
	袁安		
	何敞		
	張酺		
	韓棱		
	周章	鄭眾、蔡倫等皆秉執豫政，章數進直言	卷 33，頁 1157
	樂恢	廉直介立	卷 43，頁 1477
	張禹	聞車駕當進幸江陵，以爲不宜冒險遠，驛馬上諫／新野君病，皇太后車駕幸其第。……比三上，固爭，乃還宮	卷 44，頁 1498、1499
	周榮	故常勅妻子，若卒遇飛禍，無得殯斂，冀以區區腐身覺悟朝廷	卷 45，頁 1537
	李法	正言極辭，無改於舊	卷 48，頁 1601
	崔駰	前後奏記數十，指切長短。憲不能容	卷 52，頁 1721-1722
鄧后臨朝	魯丕	以篤學質直稱	《後漢紀》，卷 16，頁 442
	許敬	以臧否爲己任，……直道而進，無所屈撓	《後漢紀》，卷 18，頁 497
	周章	(見上)	
	張禹		
	許敬		
	鄧康	數上書長樂宮諫爭，宜崇公室，自損私權／有方正稱，名重朝廷	卷 16，頁 606
	蘇章	數陳得失，其言甚直	卷 31，頁 1107
	桓焉	安帝廢太子爲濟陰王，安世與太常桓焉、太僕來歷等共正議諫爭／廷議守正	卷 36，頁 1226； 卷 37，頁 1257
	杜根	言事者見杜根、成翊世等新蒙表錄，顯列二臺，必承風響應，爭爲切直	卷 46，頁 1557
	成翊世		
	楊震	抗直方以臨權枉，先公道而後身名	卷 54，頁 1791

皇帝	人物	直諫形容及表現	出處
	張皓	時安帝廢皇太子為濟陰王，皓與太常桓焉、太僕來歷廷爭之	卷 56，頁 1815
	李郃	數陳得失，有忠臣節	卷 82 上，頁 2718
	陳忠	以直言為名	《後漢紀》，卷 17，頁 465
安帝	鄧康	(見上)	
	蘇章		
	桓焉		
	杜根		
	成翊世		
	楊震		
	張皓		
	李郃		
	陳忠		
	許敬		
	來歷	帝與左右患之，乃使中常侍奉詔脅羣臣……，歷獨守闕，連日不肯去	卷 15，頁 591-592
	朱寵	肉袒輿櫬，上疏追訟鸞／自為宰相，數抗直言	卷 16，頁 617； 《後漢紀》，卷 18，頁 497
	鄭安世	安帝廢太子為濟陰王，安世與太常桓焉、太僕來歷等共正議諫爭	卷 36，頁 1226
	荀遷	嚴毅剛直	卷 39，頁 1308
順帝	第五穎	與太僕來歷等共守闕固爭	卷 41，頁 1402
	翟酺	時安帝始親政事，追感祖母宋貴人，悉封其家。……酺上疏諫曰……／屢因災異，多所匡正	卷 48，頁 1602、1605
	王龔	深疾宦官專權，志在匡正	卷 56，頁 1820
	張衡	帝引在帷幄，諷議左右	卷 59，頁 1914
	趙騰	震隱其狂直	《後漢紀》，卷 17，頁 478
	來歷	(見上)	
	鄧康		
	朱寵		
	蘇章		

皇帝	人物	直諫形容及表現	出處
	桓焉		
	第五頡		
	翟酺		
	張皓		
	張衡		
	王龔		
	成翊世		
	許敬		
	李固	忠貞之操，好是正直，卓冠古人，當世莫及	卷 30 下，頁 1070
	郎顗	順帝時，災異屢見，……顗乃詣闕拜章曰……	卷 30 下，頁 1054
	滕撫	性方直，不交權執	卷 38，頁 1280
	郭虔	順帝欲立皇后，……議欲探籌，以神定選。 〔胡〕廣與尚書郭虔、史敞上疏諫曰……／其後天下大赦，賊雖頗解，而官猶無備，流叛之餘，數月復起。〔左〕雄與僕射郭虔共上疏	卷 44，頁 1505； 卷 61，頁 2019
	龐參	名忠直，數為左右所陷毀	卷 51，頁 1691
	樂巴	性質直	卷 57，頁 1841
	張綱	帝雖知綱言直，終不忍用	卷 56，頁 1817
	趙騰	騰等雖干上犯法，所言本欲盡忠正諫	卷 56，頁 1816
	虞詡	好刺舉，無所回容	卷 58，頁 1873
	左雄	雄數言事，其辭深切	卷 61，頁 2015
	周舉	上書言當世得失，辭甚切正	卷 61，頁 2024
	黃瓊	爭議朝堂，莫能抗奪	卷 61，頁 2033
	杜喬	李固見廢，內外喪氣，羣臣側足而立，唯喬正色無所回撓	卷 63，頁 2093
	楊倫	激以求直	卷 79 上，頁 2564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王欽若 Wang Qinruo 等編纂，周勛初 Zhou Xunchu 等校訂，《冊府元龜（校訂本）》*Cefu yuangui (jiaodingben)* 第 6 冊，南京 Nanjing：鳳凰出版社 Fenghuang chubanshe，2006。
- 王鳴盛 Wang Mingsheng 著，黃曙輝 Huang Shuhui 點校，《十七史商榷》*Shiqi shi shangque*，上海 Shanghai：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shudian chubanshe，2005。
- 范曄 Fan Ye 撰，李賢 Li Xian 等注，《後漢書》*Houhanshu*，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65。
- 袁宏 Yuan Hong 撰，周天游 Zhou Tianyou 校注，《後漢紀校注》*Houhanji jiaozhu*，天津 Tianjin：天津古籍出版社 Tianjin guji chubanshe，1987。
- 常璩 Chang Qu 撰，任乃強 Ren Naiqiang 校注，《華陽國志校補圖注》*Huayang guozhi jiaobu tuzhu*，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1987。
- 陳立 Chen Li 撰，吳則虞 Wu Zeyu 點校，《白虎通疏證》*Baihutong shuzheng*，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94。
- 楊伯峻 Yang Bojun 譯注，《論語譯注》*Lunyu yizhu*，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80。
- 顧炎武 Gu Yanwu 著，陳垣 Chen Yuan 校注，《日知錄校注》*Rizhilu jiaozhu*，合肥 Hefei：安徽大學出版社 Anhui daxue chubanshe，2007。

二、近人論著

- 川勝義雄 Kawakatsu Yoshio 著，徐谷梵 Xu Gufan、李濟滄 Li Jicang 譯，《六朝貴族制社會研究》*Liuchao guizuzhi shehui yanjiu*，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2007。
- 甘懷真 Kan Huai-chen，《皇權、禮儀與經典詮釋：中國古代政治史研究》*Huangquan, liyi yu jingdian quanshi: Zhongguo gudai zhengzhi shi yanjiu*，上海 Shanghai：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Huadong shifan daxue chubanshe，2008。
- 田餘慶 Tian Yuqing，《東晉門閥政治》*Dongjin menfa zhengzhi*，北京 Beijing：北京大學出版社 Beijing daxue chubanshe，1989。

- 白品鍵 Pai Pin-chien, 《士與漢代文化搏成研究：儒學、吏事與方術的揉合與實踐》*Shi yu Handai wenhua tuancheng yanjiu: Ruxue, lishi yu fangshu de rouhe yu shijian*, 臺北 Taipei：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研究所博士論文 Guoli Taiwan daxue Zhongguo wenxue xi yanjiusuo boshi lunwen, 2014。
- 余英時 Yü Ying-shih, 《中國知識階層史論：古代篇》*Zhongguo zhishi jieceng shilun: gudai pian*, 臺北 Taipei：聯經出版 Lianjing chuban, 1980。
- _____, 《史學與傳統》*Shixue yu chuantong*, 臺北 Taipei：時報文化出版 Shibao wenhua chuban, 1982。
- _____, 《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Zhongguo sixiang chuantong de xiandai quanshi*, 臺北 Taipei：聯經出版 Lianjing chuban, 1987。
- _____, 《朱熹的歷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Zhu Xi de lishi shijie: Songdai shidafu zhengzhi wenhua de yanjiu*, 北京 Beijing：三聯書店 Sanlian shudian, 2004。
- 金發根 Chin Fa-ken, 〈東漢黨錮人物的分析〉“Donghan danggu renwu de fenxi”,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Zhongyang yanjiuyuan lishi yuyan yanjiusuo jikan*, 34 下, 臺北 Taipei：1963, 頁 505-558。
- 祝總斌 Zhu Zongbin, 《兩漢魏晉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Liang Han Wei Jin Nanbeichao zaixiang zhidu yanjiu*, 北京 Beijing：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Zhongguo shehui kexue chubanshe, 1990。
- 孫家洲 Sun Jiazhou, 〈漢代諫議制度的文化解讀：從李雲「露布諫帝」獲罪談起〉“Handai jianyi zhidu de wenhua jiedu: cong Li Yun ‘lubu jian di’ huozui tanqi”, 收入黎明釗 Lai Ming-chiu 編, 《漢帝國的制度與社會秩序》*Han diguo de zhidu yu shehui zhixu*, 香港 Hong Kong：牛津大學出版社 Niu Jin daxue chubanshe, 2012, 頁 167-183。
- 紙屋正和 Kamiya Masakazu 著, 朱海濱 Zhu Haibin 譯, 《漢代郡縣制的展開》*Handai junxianzhi de zhankai*, 上海 Shanghai：復旦大學出版社 Fudan daxue chubanshe, 2016。
- 張蓓蓓 Chang Pei-pei, 《東漢士風及其轉變》*Donghan shifeng ji qi zhuanbian*, 臺北 Taipei：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 Guoli Taiwan daxue wenxueyuan, 1985。
- 張磊夫 Rafe de Crespigny 著, 鄒秋筠 Zou Qiuyun 譯, 《洛陽大火：公元 23-220 年的後漢史》*Luoyang dahuo: gongyuan 23-220 nian de Houhanshi*, 北京 Beijing：北京大學出版社 Beijing daxue chubanshe, 2023。
- 陳啟雲 Chen Qiyun, 《儒學與漢代歷史文化：陳啟雲文集二》*Ruxue yu Handai lishi wenhua: Chen Qiyun wenji 2*, 桂林 Guilin：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Guangxi shifan daxue chubanshe, 2007。

- 陳寅恪 Chen Yinque, 《陳寅恪集：讀書札記二集》 *Chen Yinque ji: Dushu zhaji er ji*, 北京 Beijing: 三聯書店 Sanlian shudian, 2001。
- 楊鴻年 Yang Hongnian, 《漢魏制度叢考》 *Han Wei zhidu congkao*, 武漢 Wuhan: 武漢大學出版社 Wuhan daxue chubanshe, 2005。
- 劉咸炘 Liu Xianxin 著, 黃曙輝 Huang Shuhui 編校, 《劉咸炘學術論集：史學編》 *Liu Xianxin xueshu lunji: shixue bian* 上冊, 桂林 Guilin: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Guangxi shifan daxue chubanshe, 2007。
- 閻步克 Yan Buke, 《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 *Shidafu zhengzhi yansheng shigao*, 北京 Beijing: 北京大學出版社 Beijing daxue chubanshe, 2003。
- 嚴耕望 Yan Gengwang, 《中國政治制度史綱》 *Zhongguo zhengzhi zhidu shigang*, 上海 Shanghai: 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 2014。
- 狩野直禎 Kano Naosada, 《後漢政治史の研究》 *Gokan seijishi no kenkyū*, 京都 Kyoto: 同朋舎出版 Dōhōsha shuppan, 1993。
- 渡邊将智 Watanabe Masatomo, 〈後漢順帝の親政とその統治の展開〉“Gokan Juntei no shinsei to sono tōchi no tenkai”, 《史滴》 *Shiteki*, 38, 東京 Tokyo: 2016, 頁 20-44。
- 影山輝國 Kageyama Terukuni, 〈漢代における災異と政治—宰相の災異責任を中心に—〉“Kandai ni okeru saii to seiji: saishō no saii sekinin wo chūshin ni”, 《史学雑誌》 *Shigaku zasshi*, 90.8, 東京 Tokyo: 1981, 頁 1248-1270。doi: 10.24471/shigaku.90.8_1248
- de Crespigny, Rafe. *Fire over Luoyang: A History of the Later Han Dynasty, 23-220 AD*. Leiden: Brill, 2017. doi: 10.1163/9789004325203

The Rise of Direct Remonstrance in the Mid-to-Late Eastern Han Dynasty: A Study of Joint Governance between the Emperor and Confucian Bureaucrats during the Yongjian Period (126-131)

Hoi Wai Hang

Institute of History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waihang29@gmail.com

ABSTRACT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rise of direct remonstrance in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began with the protest movements following Emperor An's 安帝 (r. 106-125) assumption of personal rule. By the Yongjian 永建 period (126-131), as the empress dowager did not assume control and eunuch power rapidly declined, Confucian bureaucrats took advantage of the temporary power vacuum to establish a joint governance with Emperor Shun 順帝 (r. 125-144), actively promoting direct remonstrance.

However, during the Yangjia 陽嘉 period (132-135), as Emperor Shun increasingly relied on eunuchs and consorts, the joint governance structure weakened. Confucian officials' remonstrations shifted to criticizing Shun's favoritism towards sycophants, increasingly diminishing the emperor's authority, which led to rising tensions and set the stage for later collective condemnation during Emperor Huan's 桓帝 reign (146-168).

Confucian bureaucrats viewed direct remonstrance as a sign of loyalty, as a way to distinguish between virtuous and corrupt officials. This indicates that the self-awareness and collective identity of Confucian scholar-officials had already started to emerge as early as the Yongjian era. Thus, the Yongjian and Yangjia eras under Emperor Shun represent a critical period of transformation in 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Key words: Emperor Shun of Han 漢順帝, Yongjian 永建, direct remonstrance, ruler-minister relations, Confucian bureaucrats

(收稿日期：2024. 1. 30；修正稿日期：2024. 6. 20；通過刊登日期：2024. 8. 21)